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广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黎 玉 04

【峥嵘岁月】

英雄吕宝兰 黄立宇 唐少清 杜 帅 10

小山前村的红色故事
王维月口述 李祥瑞整理 16

红小鬼讲的故事 王宗富 21

铁军大帐追歌行（九）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23

【名人素描】

模范政委吴岱（上） 佚 名 29

国家危难时的庄翰林一家人 荣士友 34

【文化掇英】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九）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8

【蒙山沂水】

沂河的历史趣闻 mBF9 41

【史海撷萃】

兖州城敌特组织被“钓”记 谷守春 44

【文史论坛】

季氏与费县（中） 丁兆铭 48

【探索发现】

飞上郯城城头的张桂林 高 雷 54

【古城旧事】

记忆中的老建筑——沂州集柳碑亭 本 编 58

【诗画欣赏】

嘉树堂藏《元拓足本金普照寺碑》略说 陈麦青 59

【影像沂蒙】

小沙东海战 大荒堂主 63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孙姓（一） 赵丹峰 65

【沂蒙乡亲】

袁芳烈与温州模式 沈绍真 70

【沂蒙名医】

“精明”之玉壶冰心
——记李松奎 刘凤才 74

【史志动态】

80

封面：沂州集柳碑亭
(详见本期《沂州集柳碑亭》)

封底：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军争》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印 数：6000册
发送对象：临沂市史志系统内部

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黎 玉



黎玉与范明枢

1937年4月，我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的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翌日，党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回到山东以后，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省委整顿了领导机关和各地党的组织。经过整顿后的山东省委，党中央批准我任省委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11月16日，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进犯到黄河北岸。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济南秘密开会，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抓紧日寇入侵、国民党逃跑、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迅速及时地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坚决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对民族解放战争应承担的任务。12月27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兼三路军指挥）携款逃跑，国民党的十万大军，连同各县县长、警备队，昼夜南溃。山东父老遭受敌寇的屠杀蹂

躏，陷入呼援无应的状态之中。

当时，山东省委机关已转移至泰安与泰安县委汇合。我和林浩等同志经过周密的考虑，选择了日寇的兵车开抵大汶口、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溃退之际，在徂徕山南麓的山阳村程煦轩同志的家里研究了起义方案，并派赵杰等同志到良庄一带进行组织工作，洪涛同志临起义前到省委汇报。1938年1月1日，于徂徕山的大华寺内举行起义誓师大会。那天，寒风凛冽，树叶飘零，但参加起义的人们，个个热血沸腾，激动得脸上沁出了汗珠。举手宣誓的有平津流亡的学生、民先队员、济南同学会的会员、泰安抗敌自卫团的会员、泰安封家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团员以及小学教师和市民，一共百余人。大家擎着仅有的几支陈旧的步枪和大刀、梭镖，庄严地宣誓，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抗战到底！

宣誓以后，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赵杰分任正副支队司令，我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徂徕山成为山东八路军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在山东抗战史上，成了一个可贵的名字。

在创建沂蒙根据地的初期，省委机关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活动地点是以沂水县的王庄，沂南县的青驼寺、岸堤为中心。当时八路军部队的主要力量，是徂徕山起义的四支队。1938年12月上旬，山东纵队调集在鲁东组建的七、八两支队南下，进驻沂水、临朐一带。这几支八路军，虽然未经过严格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武器装备低劣，既要与久经训练、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又要和伪顽分子斗争。但由于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模范的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因而，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我们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广泛地组织游击小组，武装群众，加强自卫力量，袭扰敌人，迷惑敌人，破坏敌人交通。同时，在根据地内部实行空室清野，组织群众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帮助军带路、送信、抬担架、侦察，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军民联防。军民一家，配合作战，成为发展巩固根据地的先决条件。

山东分局利用统战关系组成的国民抗敌自卫军，也是这个地区较早的抗日武装。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抗战初期，他们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编入了八路军。

1939年4月底，党中央派徐向前来山东工作。徐向前与朱瑞同志于6月间到达鲁中地区，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部队。6月21日，中央军委及十八集团军总部又电令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肖华一部进驻鲁南，我主力部队的力量更加强大，依靠八路军的主力及地方武装与人民自卫武装的结合，既具有分散坚持游击战的能力，又提高了灵活机动作战的水平，使我党我军在沂蒙山区逐步取得了有利地位，稳定了沂蒙山区抗日的局面，使创建沂蒙根据地有了可靠的依托。

遵照党中央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指示，在沂蒙根据地加强了群众工作，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抗战中来，普遍实行国民教育，村村建立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许多地方连四五十岁的妇女都争先恐后地上识字班，读书识字，学革命道理。青年妇女还学习射击、投弹等本领，参加民兵游击小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今天，沂蒙山区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部队担任一些重要职务的妇女同志们，当年多数是在识字班中读书识字，明白了革命道理，而踏上革命征程的。

在创建沂蒙根据地中，认真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当时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坚持团结抗战的党派及无党派抗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对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忠实抗战建国的各种人才，善于团结、珍惜、爱护，诚心相待，共同合作。对于他们当中参加八路军及各级机关的真心抗日人士，则给以优于一般共产党员的特别待遇，我们还欢迎文化工作者、新闻记者、教育家、学者专家奔赴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

建国工作。由于坚决贯彻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些德高望重的名人、学者和知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云集沂蒙山区，同心同德为建设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的贡献。当时，被人们称赞为抗战寿星的范明枢先生，在“一·二八”事变时，曾同进步青年一起因从事救亡运动被捕入狱，饱尝反动派所给予的铁窗之苦。抗战后来到沂蒙山区，已年近八旬，仍不顾高山路陡，为抗战四处奔忙，虽酷暑寒冬，亦不懈怠。作家白刃、画家王绍洛、木刻家那逊、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也都曾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从事过战斗和文化经济建设，并且培养造就了大批宣传、文化、教育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

进入1940年，沂蒙根据地已经成为指导全省贯彻党中央指示、推动抗战的基地。在这里，建立了全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与省战工会，制定了全省的施政纲领与各种单行法规，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与财政文教会议，确定了全省的行政方针，统一了各级行政组织。

1940年7月26日到8月26日，在青驼寺召开了包括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各救代表联合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300名代表，有鲁西、胶东、鲁南、鲁北、清河、鲁中的国大初选代表，有工农青妇文化界以及动委会等救亡团体的各级领袖；有清朝的举人、廪生、秀才，有当代的博士、硕士、学士，有法官、律师、医生；有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有工人农民；有须发斑白的抗战老人，有活泼天真的青年男女，他们肩负着全省人民的重托，冲破了敌人的无数封锁线，经过了千百里的跋涉，来到沂蒙根据地，共商抗战大计，为坚持山东团结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雄壮的联合大会会歌，仿佛仍在耳畔回荡：

蜿蜒的沂水，
巍峨的蒙山，
前进的战士们，
盛会空前。
我们在抗战中成长，
我们在烽火中锻炼，
三千八百万人的意志，
已铸成钢铁的巨拳。
粉碎投降的危险，
挣断奴隶的铁链。
听啊！
全山东人民一齐高呼，
团结到底，抗战到底！
看啊！
自由的光芒，
在晨曦中辉耀。
解放的旗帜，
在黎明中招展！
蜿蜒的沂水，
巍峨的蒙山，
前进，战士们！
盛会空前！

会后，在全省组织了一切抗日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活动展开了针



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场

锋相对的斗争。沂蒙根据地，屹立着，犹如泰山之不可拔一样。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抗日战略基地，又有了联合大会以后的工作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的领导下，以沂蒙根据地为发源地，在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十项建设运动，使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沂蒙根据地从它创建的第一天起，就是在抗击日伪的残酷“扫荡”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1938年底到1939年，日本侵略军已从胶济、津浦等铁路沿线深进到沂蒙山区，蒙阴、沂水、莒县、费县等县城均被日伪占领，在一些较大的镇店都设了据点，一时据点林立，封锁线纵横。这时，以沈鸿烈为首的溃散支离的国民党省政府，以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为主力也进入鲁中地区，以沂水县九区东里店（现属沂源县）为省府驻地。吴化文的师部驻在沂水八区的张家庄（现属沂源县），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以及军统特务、别动队等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也相继进入鲁中及鲁南地区。这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部队，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勾结日寇，限制破坏我党的活动，陷害抗战力量，这就使沂蒙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我们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出动两万余人，对我鲁中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山东纵队的特务团及一、二、三、四支队和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群众的配合下与敌人浴血奋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击溃了日寇的进攻，保存了主力，保卫了沂蒙根据地。在战斗中，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十八勇士，在岱崮抗击了日寇五百多精锐部队的进攻，最后弹尽援绝，十八勇士宁死不屈，跳下了陡峭的悬崖。战士们的鲜血，为了保卫伟大祖国的国土，洒在巍峨的岱崮山涧里。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数英烈把热血洒在沂蒙山区的土地上，值得我们永

远怀念。日寇合击东蒙山时，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政治指导员程克同志，带领一个排掩护群众转移，由于敌众我寡，最后只剩下五位战士，坚守一间民房。敌人用喷火器点燃了房子，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火腾空，只听到从屋里传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烈火吞噬了五位英雄战士的生命，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群众安全转移了。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和机关干部的那种鱼水情、骨肉亲，使我铭刻心底。正是由于沂蒙山区人民群众的心与人民子弟兵息息相通，紧紧相连，才使我们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沂蒙山区送出了无数优秀的子弟，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无数父老兄弟姐妹为掩护抢救我党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而抛头颅洒热血，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出自己的亲人。

1942年9月，日寇扫荡我根据地，当时沂水县西墙峪的张孝治家中住着七位伤员。日寇逼进西墙峪时，在枪林弹雨中，张孝治把伤员一个个背到村外的山洞里掩护起来，又跑回家背年迈的父亲。刚到家门口，遇到我野战医院的田桂英同志身负重伤，跑到张孝治的大门前跌倒了，张孝治的老父亲一见，连忙招呼儿子把自己放下，让他背起田桂英同志冲出重围。田桂英同志得救了，但张孝治的老父亲却倒在敌人的刺刀之下。还有一次，我军一位女同志把自己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托给沂南县的一位大嫂喂养。当时，那位大嫂也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便带着两个婴儿藏在山洞里。敌人搜山的紧张时刻，大嫂的孩子由于饥饿和阵阵枪声的震惊而哇哇啼哭，大嫂怕哭声会引来敌人，便用乳头紧紧塞住孩子的嘴，孩子窒息了，却保住我军那位女同志的孩子。现在那位女同志的孩子该有四十岁了，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想，他若得知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应该对沂蒙山区的父老兄弟和姐妹们产生何等深沉的感情呢？

当时，在中心根据地都有耆老抗敌救国会的组织，大都是50岁以上80岁以下进步老人。他们操练时，都手擎红缨枪，威风凛凛，学习时则热烈紧张。他们喊出响亮的口号：“我们要做新时代的老青年！”沂南县的耆老会长刘心甫，年过60，一次，五六十个伪军突然包围了刘老的住宅，刘老的儿子用手榴弹还击敌人，中弹身亡。刘老先生举着一颗手榴弹，与敌人搏斗，被敌人击倒，幸亏附近的游击小组闻声赶来援救，刘老才幸免于难。事后，他说：“宁成战死鬼，不作阶下囚！”

在抗日根据地，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普遍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包围敌人，扰乱敌人，用全体人民的力量封锁敌人，用强大的主力军打击和消灭敌人。

1940年的7月，日伪500余人，携带钢炮及迫击炮各数门，轻重机枪十余挺，进犯费县境内的太平庄。太平庄民众抗敌自卫团，为掩护村内民众撤退，以破枪土炮与敌奋战，敌人凭借猛烈的炮火，发炮三百余发，接连六七次冲锋，均被击退，毙敌伪百余名，最后因弹药殆尽而退出战斗。太平庄抗击日伪的胜利，是发扬民众威力，保卫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缩影。其实，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每座山头都燃烧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每一块土地都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反扫荡斗争，每个村落都洒下了抗敌勇士的鲜血。

1941年到1942年，沂蒙根据地处于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和分割封锁之下，处于国民党投降派公开投敌、助敌夹击我军之中，我党我军依靠根据地的群众，依靠八路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人民自卫武装的普遍结合，并且创造性地发挥了游击小组、武工队的独特作用，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蚕食、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和封锁。逐个击破了敌人的据点，使边缘区逐步纳入根据地，把日伪军围困在县城、较大集镇的据点和主要交通线上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开展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坚决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利用

伪属关系，全面开展“唤子索夫”运动。对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我军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红点多的可以赎罪；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一个黑点，并把事实登记起来，黑点多了就要受到惩罚。伪军官兵在我军政治攻势和瓦解工作中，积极同我们拉关系，争取伪军的工作有了迅速发展。

1944年5月，鲁南发起了讨伐伪军荣子恒战役，全歼荣部第二师，毙敌伪师长刘国模以下敌伪200多人，俘敌伪官兵500余人。鲁中部队于5月15日解放沂水城，击毙日军队长、小队长和顾问以下45人，俘日军20人，歼灭伪军1000多人。从8月份起，我军连克冶源、五井、临朐城敌伪据点23处。11月14日，莒县伪军莫正民部3500多人起义，使滨海与鲁中地区连成一片。翌年3月8日，我鲁中部队又攻克蒙阴城，使鲁山、蒙山、沂山、泰山各山区连成一片。滨海、渤海、鲁南、胶东、鲁西均捷报频传。这时，自胶济路至河北平原，在八路军相互配合之下联结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45年的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成立了山东省政府，推选了我为省政府主席。

在山东军区发出五路大军进攻收复大城市命令的同时，省政委会（省政府前身）和山东军区等领导机关在驻地召开了庆祝大会。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高举中国共产党党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妇女会、识字班送来军鞋、鸡蛋、慰问袋，八九岁的娃娃也扛着红樱枪，高唱战歌，参加会议。在经历了民族压迫的八年苦难深渊后，军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沂蒙根据地的孟良崮、岱崮、抱犊崮、沂山、鲁山、蒙山以及沂河两岸的山涧河谷里到处回荡着动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歌声激励着八路军的英雄健儿，带着老乡们的深切嘱托，奔向新的征程，向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英雄吕宝兰

黄立宇 唐少清 杜 帅



1947年3月，时在陕北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写下了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字是写给1947年初牺牲在山西省云周西村的革命先烈、优秀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的。伴随着这个题词，刘胡兰的名字与她的事迹一起响彻全国，至今仍被人们所牢记、传唱。

而人们所不熟知的是，就在同一年，沂蒙大地上同样有一位风华正茂、如兰花般高洁的优秀女共产党员，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或许从今天看来，她的名字不像刘胡兰那样响亮，可她的故事却同样震撼心灵。她的名字不容被遗漏，她的事迹不应被忘怀，而应深深镌刻在“沂蒙精神”的巍峨丰碑上，百代流芳、永世相传。

她，就是党和沂蒙人民的好女儿——吕宝兰。

一、西崖有湖，吕家有女

1924年，吕宝兰生于罗庄的湖西崖——说起湖西崖的“湖”，临沂人都不陌生：它现在的名字叫做“双月湖”，临沂市罗庄区党委政府就坐落在此，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可謂是“大美新”临沂的一处美景胜地。

而在以前，它被称作“泥沱湖”。清《沂州志》中记载：“在州南二十里，中有圆洲，夏秋菱荷并茂，月夜泛舟，洲上香风四来，花气拂人，宛如仙境。”民国时《临沂县志》则如此记述：“泥沱湖……周十余里，中有圆洲，水环如镜，俗称泥沱月色即

此。”“泥沱月色”也是临沂历史上著名的“琅琊八景”之一。泥沱湖四周有几个村子环绕着，正西面就是湖西崖。

吕宝兰虽然出生在这个美不胜收的泥沱湖边上，但在那种时代，再好看的自然景观也不能让食不果腹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老百姓对这个湖有个更加接地气的名字：泥汤湖。这个名字，形象地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和直白。同时，恐怕也包含着对当时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泥泞生活，发自内心的控诉吧……

吕宝兰的父亲叫吕其太，家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吕宝秀，大女儿吕宝兰，二儿子吕宝荣，二女儿吕宝桂，吕宝兰在家中是长女，排行老二。吕家因为没有自己的田地，只能给地主当牛做马，生活极其艰难。吕宝兰的父亲吕其太有个未出五服的本家，名叫吕其昌，平时尽其所能帮助吕宝兰家，打小吕宝兰就从心底感激这位堂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吕其昌在生活上帮助过她们家，而是吕宝兰在人生追求和信仰的树立上，与吕其昌大有关系。

早在1939年，吕其昌就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参加过铲除汉奸的地下活动。他还几次出生入死，为组织传送过重要情报。他根据组织安排，在临沂城南成立了第一个工人组织——工友会。一早一晚，练练场子，强身健体，也把革命的道理传授给了他们。吕其昌的工友会吸引了渐渐长大的吕宝兰，她向往有一天能参加这样的组织，能和男人一样行侠仗义，让老百姓不受有钱人的欺负——她没有想到，她为了这份理想和追求，会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在她的理想没有实现之前，她的家里依旧受到地主的欺凌。

当时湖西崖有个远近闻名的地主，外号“张霸天”，有2000多亩田产，吕宝兰家租种了张家20亩地，一家6口起五更、睡半夜，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卖命，却连肚皮也填不饱，受尽了盘剥，老实巴交的吕其太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1941年的秋天，吕家租种的田地遇上了龙卷风，颗粒无收。吕其太哀求张霸天把地租给免了，可张霸天硬是带着一群狗腿子，扒走了一家人准备过冬的口粮。

大儿子吕宝秀气不过，摸起菜刀要去找他们拼命。吕其太怕他出去惹出大乱子，就把他绑在了自家院子里的榆树上。吕其昌闻讯赶来，解开了孩子的绳索，拉着吕其太一起去找“张霸天”评理，吕其太死活不去，蹲在地上，抱着脑袋，一个劲地抱怨自己的命苦，活该受罪。就在那一年年尾，吕其太带着全家六口远走他乡，一路讨饭到了沐水县兴云区（现属莒南县），在杨家三义口村安下了家。

二、投身革命，百炼成钢

来到杨家三义口村安家之后，吕宝兰发觉这里自然景观虽然没有“泥沱湖”优美，却有另一番景象——杨家三义口村是解放区，隶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滨海区抗日根据地，那里是八路军开辟出来的红色热土。

在那里吕宝兰第一次听到那么动听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当家作主的不再是吆五喝六的财主，而是和她一样的贫苦百姓。过了一段时间后，她才知道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一一五师从山西挺进山东，在这里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在这里，这一带迅速成为山东的首府。这里，是催生革命爱国者、实现人生理想最好的土壤。

大哥吕宝秀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上立功受奖，当年就入了党、提了干；父亲吕其太入了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一个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传统农民，成长为有胆有识的农救会干部；弟弟吕宝荣、妹妹吕宝桂则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读书

识字，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聪明机灵的兄妹俩很快成为儿童团的骨干……

吕宝兰进了识字班，参加了妇救会，投身革命工作，进步得很快，于1944年光荣入党。她大胆泼辣，工作出色，被推选为兴云区妇救会长，成为区里主要领导之一。

吕宝兰一家就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浴火重生，百炼成钢。值得一提的是，宝兰曾去部队看望哥哥，临别时哥哥送给了她一件看似不起眼的礼物：一枚小小的军哨。

三、回到家乡，开展土改

1945年9月11日，临沂城解放。吕宝兰被党组织选派返回家乡到朱陈区担任妇女委员。考虑到她们一家是个革命家庭，就安排一起迁回原籍安家，让她父亲吕其太负责开展农救会工作。吕宝兰在临沂城参加完山东省第二届妇救会代表大会后，就按时到朱陈区赴任，主要负责湖西崖乡的包片工作。由于本身是当地人，加之吕其昌等同志在湖西崖打下的工作基础，工作迅速展开。

1945年12月7日，临沂县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活动分子大会在临沂城召开。上级要求，按照“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规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鉴于临沂县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减租减息与反汉奸、反贪污、反恶霸的群众诉苦清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吕宝兰主持召开了湖西崖群众诉苦清算大会，对湖西崖村的张霸天进行了清算。大半天功夫，就清算出多交的租粮6097公斤，找回工资粮1217公斤，霸占的土地118亩，抢占的大牲畜9头，农具46件套。吕其太、吕其昌他们带上民兵押着张霸天，潮水般涌向张家大院。

佃户们抬着、扛着、拉着那些本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据我们采访的吕宝兰本家侄子吕金梁先生讲，听他祖辈上讲这段历史时，老一辈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整个湖西崖比过年还热闹！”

不久，华东局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一场暴风骤雨似的土地改革，在沂蒙大地上迅速拉开了帷幕，并一步步推向高潮。吕宝兰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没收了张霸天等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贫雇农都按人头分到了土地，还或多或少地分到了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部分浮财。到1946年9月初，朱陈区94个村庄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毕，4000余户贫雇农获得了土地，近4000户中农得到了利益，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圆了庄户人家几代人的“土地梦”，根深蒂固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崩瓦解。县政府又给每家每户颁发了土地证，保障翻身农民的土地权，让群众吃了“定心丸”。土地改革触动了张霸天等地主们的根本利益，加剧了他们对吕宝兰和一些革命同志的仇恨。

四、歌声飘荡，动员参军

吕宝兰是个搞宣传的行家里手，她有一副好嗓子，吕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也是如此，都能唱出动听的歌曲。别小看唱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唱歌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吕宝兰的弟弟吕宝荣在儿童团里就喜欢唱，他教儿童团员们学唱歌曲，排演节目，进行革命宣传：“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吕宝兰的妹妹吕宝桂在村里的祠堂里教识字班识字，别看她年龄小，却是个管着182个学员的“大班长”“小老师”。还和其他人编了首《识字班歌》四处传唱：识字班里真模范，俺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各人识字各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解放区发行的纸币）……

这种歌曲朗朗上口，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吕宝兰和吕其昌一起，负责湖西崖乡的征兵工作，歌声也发挥着作用。他们传达上级的指示：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部队改编扩充，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鼓励有志青年积极参军入伍，打倒反动派，保卫胜利果实。吕其昌自己带头，让年仅15周岁的儿子吕自品报名参军。几个当场报名的青年，回到家里却被爹娘当头泼了瓢冷水，挨了一顿责骂后，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吕宝兰、吕宝桂她们闻讯，立即带着识字班的姑娘们分头上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几个如花似玉的俊俏姑娘，从报名参军的青年中选中的自己的“意中人”，并让自己的父母主动上门提亲；几个已经定过婚的姑娘，干脆直截了当地向自己的婆家挑明，要是非拦着不让去当兵，就跟“落后分子”分手……

在动员参军的过程中，湖西崖村民至今还记得吕宝兰演唱过的歌曲：“一扭二扭使劲扭，一直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八路军走……”

当年没有固定的舞台，也不去刻意的化妆，用头巾一扎，就是老汉，手里拿着一只木棍就扮上了有年纪的老者，走到哪里他们就把歌声带到哪里。歌唱到哪个村，就教会那个村的青年人和孩子。正是先辈当年用火红的青春、激荡的热血把一些优美的歌声从湖西崖唱到临沂城，再唱到蒙山沂水的各个角落，歌声燃起的烈火烘烤在岁月的刻盘上，任时间流逝而旋律永存。

有了吕其昌送子参军的模范带头作用，有了吕宝兰动听的歌声，再加上其他方式的说服动员，湖西崖出现了参军热，一次参军30多人。朱陈区青年踊跃入伍，涌现出不少党员、干部争相入伍，母送子、妻送郎、爷送孙的动人事例。

五、恶霸告密，被捕入狱

1947年，国民党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于北线歼敌，主动撤出临沂。逃亡在外的王洪九等人勾结当地张霸天等地主，组织“还乡团”回到了临沂城，对地方武装以及老百姓进行疯狂的报复。王洪九曾叫嚣：“在临沂城我不杀三千共产党和土改积极分子，我王洪九誓不为人！”

吕宝兰和区上的同志们为了避免跟敌人正面接触，就转移到湖西崖西面大约20里路的山上去，在那里一边隐蔽，一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2月22日，按照跟群众的约定是收缴军鞋的日子。一大早吕宝兰就把同志们安顿好，与父亲吕其太等人悄悄潜回村里。

进村时还很安静，“还乡团”也没有来骚扰。吕宝兰、吕其太他们在村口放上警戒进了村子。好久没有见面了，大娘、大婶、大嫂们非常想念，一见面都很亲热。她们从床底下、柴草堆等隐蔽的地方翻出军鞋来，交到吕宝兰他们的手里。

没想到的是，吕宝兰和同志们进村的消息被张霸天的人给盯上了梢。就在吕宝兰他们收拾好军鞋准备返回的时候，突然传来枪声，值勤民兵气喘吁吁地向这里跑来，大声地喊：“‘还乡团’来了！”100多个保安团的团丁们端着长枪，从几个方向围拢而来。

为了避免给群众惹出麻烦，保护好大家辛辛苦苦做出的军鞋，吕宝兰和吕其太断然决定，带领大家把敌人引开。他们让两个民兵背上装满军鞋的几个大麻袋，找个草垛躲藏起来，剩下的同志跟着他们向村子西南方向的凤凰岭撤退。

怎么样才能把敌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呢？吕宝兰马上想到挂在脖子上的军哨，她边跑边吹响了哨子。哨声在那天被吕宝兰吹得格外响亮，那哨声就象一条套住狼犬的绳索一样，把敌人牵引了过来。虽然殊死抵抗，可敌众我寡，最终吕宝兰一行20多

人除背着军鞋早已隐蔽起来的2人外，其余同志全部被俘。吕宝兰他们被绳捆索绑，投进了王洪九的杀人魔窟——临沂监狱。

六、深陷魔窟，惨受折磨

在百般凌辱和惨无人道方面，王洪九比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发明创造”出一些令人发指的杀人手段：“放天花”“拉锯”“点名”“下水饺”“点天灯”“穿纱布大褂”……吕宝兰被投进王洪九的魔窟后，受到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吕宝兰一家6口，一下子被抓进去4口，由于她是干部，因此格外受到“照顾”。

为了挖出共产党的机密和当地领导人藏身之处，王洪九指使他的特务队用尽各种毒辣手段对她进行审讯。敌人每逼问她一次，就换一种刑具给她用刑。压杠子，灌辣椒水，火烧脚心，竹签钉手指，电乳头……敌人还利用所谓轻度用刑战术，用旧县衙留下的拶子拶她的手指，连续拶了3天3夜。酷刑都用遍了，吕宝兰一次又一次的昏死过去，半点也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只要清醒，吕宝兰就正告那些丧心病狂的敌人：“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反革命，你们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共产党迟早会跟你们一一清算的！”吕其太也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

面对这么坚强的父子、父女，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招数，妄图逼吕宝兰就范——让吕宝兰陪审，亲眼目睹她的父亲、弟弟、妹妹过堂、受刑。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在痛苦中煎熬；听着亲人们那撕心裂肺、凄厉无助的惨叫，怎不令人肝肠寸断！吕宝兰眼含泪水，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破口大骂，并不断鼓励亲人不要向敌人屈服。

敌人失败了，彻底败在了她们一家人的面前。所有的刑具对她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阴险狡诈的刽子手们黔驴技穷。“还乡团”见吕其太、吕宝荣父子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就对他们下了毒手。

他们再一次把父子二人毒打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将他们拉到了沂河桥上。在他们身上绑上大石头，抛进了滚滚的沂河里。

阴暗潮湿的大牢里，吕宝兰搂住了孤苦伶仃的妹妹。她慢慢地解下军哨，郑重地挂在了吕宝桂的脖子上，说：“姐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哨子你好好地留着，日后作个念想，看到它就等于看到了姐。”

“姐！”吕宝桂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一头扑在吕宝兰的怀里。吕宝兰把瘦骨嶙峋的妹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中，抱着她一直坐到天亮。

七、临死不屈，英勇就义

1947年阴历四月初八，临沂逢小集。王洪九按原定计划又开始了杀人行动，在即将被杀害的20多名干部和革命群众中，吕宝兰是官职最大的一个。

丧尽天良的“还乡团”在万众面前，对20多名革命干部和群众先后使用不同手段残害致死。

他们对吕宝兰的残害更是令人发指。这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的衣服扒光，反捆双手，双脚带上镣铐，在她的乳头上挂上铃铛。他们又找来根树枝，削成一个木锥子，几个人死死地按住她，把木锥子硬硬地塞进了她的下身。然后，由刽子手强押着，在临沂城内游街示众。

到了刑场后，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又极其残忍地割去吕宝兰的两个乳房……她鲜

血直喷，疼得一下子跌倒在地……

当刽子手架起血人般的吕宝兰行刑的那一刻，她咬紧牙关猛地举起手来，强忍着痛苦，怒视着枪口，昂首呼喊革命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一阵枪响，年仅23岁的吕宝兰倒在了血泊中……

云山苍苍，沂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党的好儿女，沂蒙女英雄，永垂不朽！

包括吕宝兰在内，湖西崖一次牺牲了18口人。吕宝兰一家最后只剩下两位：吕宝兰的哥哥吕宝秀和妹妹吕宝桂。吕宝秀解放后曾在县武装部工作，因身体多处负伤致残，行动不便，后回村干过保管员等工作，1990年辞世。妹妹吕宝桂在从国民党那边当兵的修廷珍等人的帮助下，被营救出狱，她继承烈士的遗志，继续为党工作，后来嫁给了深明大义的修廷珍先生。建国后，修廷珍一直在村里从事会计工作，兢兢业业，很有口碑。两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忠厚传家，儿孙满堂。1989年，修先生因病谢世，吕宝桂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精神矍铄，锐志不减当年。

2010年，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和山东省妇联成立100周年，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评选活动，表彰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3个历史阶段，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山东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妇女英模人物，烈士吕宝兰与沂蒙母亲王换于、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一同当选，被山东省政府、省妇联评为“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被誉为“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吕宝兰烈士并没有给这个世上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她个人的画像，是我们依据她的英雄事迹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许那幅画像和吕宝兰本人的形象差距甚远，也许很相近，但了解了她的事迹后，我们觉得她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是那样的一种英雄气质。

吕宝兰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实物，就是那只军哨。那是一支铜哨，上面写有数字“1941”和英文“BEST”，轻轻吹起，它居然还是那么响亮……

英雄吕宝兰，她就像那只铜哨一样，虽久经磨砺、毫不显眼，却捶砸不破、硬胜磐石。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轻快嘹亮的歌声，蕴藏着振聋发聩的呐喊，那歌声和呐喊声，历经数十载，却依然回荡在沂蒙热土，回荡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吕宝兰唯一保存下来的军哨

小山前村的红色故事

王维月口述 李祥瑞整理

莒南县筵宾镇小山前村，位于平顶山前，村东北是种谷山，东面有黑虎山环绕，村南、村西地势平坦，村内“十字”大街，村东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青山绿水，风景秀丽。抗日战争时期，小山前村是滨海地区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村。1939年7月莒南县委在高家沟建立，不久县委在小山前村举办第一批党训班，建立了支部。1944年深秋，山东省第二次行政工作会议在此召开，北海银行和大众日报社迁驻小山前村。村民们踊跃参加抗战，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小山前村积极踊跃参军参战，出夫支前，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授予“支前模范连”光荣称号。

小山前村在革命战争中展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红色场景。

一、八路军为民排解纠纷

1938年7月，驻莒南岳家沟一带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奉命改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7月底，司令部政治处首先派一连和宣传科民运工作团的部分同志，到莒县九区（今莒南县十字路镇一带）开展工作，8月初，司令员罗绩伟带领三连行军来到小山前村。正巧这里因争山林闹纠纷，小山前村与某村双方都集合了不少人，在黑虎山西坡的山场，村民们扛着铁锨、镢头、爪钩、铁叉、土炮。小山前村有人竟把裕昌永酒店的“土压五”步枪都借来了。一场大的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罗司令员命令部队迅速开到山上，让部队一面守护林木，一面对群众进行教育，指导员带人到两个村的民众面前做工作，罗司令员和几位警卫员留在小山前村西打谷场里。通过说服教育，制止了这场流血事件，保住了山上的松树。中午，小山前村的村民送来了煎饼、咸菜和开水。部队在山上吃了饭，继续执行护山林的任务。直到太阳落山时，罗司令员派人通知部队回小山前村。部队来到村西打谷场上，高唱革命歌曲，吸引了很多儿童和青年人，部队借机开展宣传工作。罗司令员和村民们边笑边谈。晚饭时，罗司令员问候大家：“看了一天的

山辛苦啦！”同志们回答：“执行任务！”罗司令部高兴地说：“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就要爱人民！要关心和保护群众的利益，今天大家就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罗司令员的讲话，给指战员们上了一堂群众教育课，村民们从八路军爱护人民的言行认识到八路军和人民是一家人。

二、拥军优属和参军支前的试点村

1943年3月，为创造经验指导全省工作，山东分局确定莒南县为分局实验县，受山东分局和滨海地委双重领导。5月份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亲自带领整党工作队到小山前村进行试点。中心内容是加强教育，普训党员，健全支部，提高工作能力，民主选举村政权，完成战争、生产、民主三大任务。7月份王东年调莒北工作，杨心培继任莒南县县长。1944年1月滨海专署发布拥军指示，规定1—3月为拥军月，强调在拥军工作中做好优待优属残疾军人和伤员，动员参军等工作。县长杨心培亲自到筵宾区搞试点，在大山前村召开了100多人参加的抗属座谈会，解决抗属的实际困难，极大地调动了青壮年参军的积极性。根据大山前的经验，区长徐洪翔马上带领区干部到小山前村领导抗属、军属试点服务工作。进村后首先发动群众，把农救会、妇救会、民兵等组织起来。到军属徐志一（1940年参加革命）、王永聚（1943年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徐广田（1943年参加革命）、王洪仁（1940年7月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家慰问，帮助挑水扫院子。农救会安排在农忙时代耕代种，使军属、抗属感到温暖，调动了青壮年参军积极性。

区长在抓好小山前村工作试点同时，亲自到临近的后泉龙头村给一家抗属挑水，抗属不认识他，问村干部：“这是罚谁家的苦力？”村干部告诉她，这是咱们的区长。这家抗属说：“呵！这真是咱穷人的区长！”

筵宾区大山前村、小山前村拥军试点，带动了全县拥军拥属工作的热潮，也带动了大参军的高潮。自1944年2月13日开始，到1945年春，小山前的壮年参军形成高潮。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山前村新组建了一个连队，该村与邻村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徐风玉任营长、徐言一任连长，胡继亭任排长。在妇女干部徐广爱的带动下，徐广庆、徐贵爱三名妇女也参加了八路军。



莒南县支前大队
向前线进发

解放后，徐广爱在上海工作，徐广庆在济宁工作，徐贵爱在杭州工作。青年徐广友南征北战多次立功，在解放战争攻打四平街战役中多处受伤，是从死尸上救出来的，解放后在南京工作，任江苏省远洋公司政治处副主任，1989年参加了江苏海洋运输公司的筹建工作，1991年离休。徐富一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驻过洙边崖子、东家河等村，后来在临沂地委机关工作。十字路裕昌永酒店老板徐言日，因酒店被日军轰炸，回到小山前村，支持儿子参加八路军，三儿子徐明一随抗大一分校转战南北，解放后任崂山县委书记、青岛市畜牧局局长；四儿子徐芦一参加八路军，解放后在山东省公安厅工作；五儿子徐勤一解放后在五莲县工作。酒店职员徐风山，胆大酒量也大，在酒店干活时，一排大酒缸，酒满了往外流，他能喝得不外流。1939年深冬的一天，在村后沟用搭布（束腰的带子）捆绑了一名鬼子（王家庄子战斗中被县大队、国民党百十一师打散了的鬼子），交到芦营。回村后也积极参加了八路军。

三、参加山东行政工作会议的保卫工作

战争年代北海银行总是随着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机关点行动。1944年深秋，北海银行机关和山东省政委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驻小山前村及周边邻村。

筵宾区区长杨从仁，1941年入党，1942年在筵宾区工作，1944年9月任筵宾区区长。1944年9月份杨从仁区长同继任县委书记杨心培经常来小山前村安排工作，与群众亲如一家。因区长是邻村人，村民们都认识他。

今年89岁老人徐广来，原是村主管会计，当谈起往事，他说：当时和三叔徐松一合伙开办油坊，对外加工花生米，换油，正屋6间，还留有北门对着东西大街，院中间有一盘石碾，用来粉碎花生米，南棚养着一匹骡子，还有3间西屋。1944年秋，北海银行总机关从相邸李家宅子迁来，印钞厂设在石泉湖村。总行机关在我们村徐占元家5间大瓦房办公，部分人员住西边胡家庄村。为了安全，油房成了北海银行秘密工作点，有一匹马拴在骡棚内，西屋由银行业务员使用。本村徐品一经常领着来人到西屋联系业务，领取北海币。很安全，后来徐品一随北海银行一起调走，现今儿女们都在重要部门担任职务。

村民孙德宽讲：当时他们村有两个大伙房，两个大菜窖，其实村东边这个大菜窖是钱窖，村民们从不过问，因为有保密的纪律。解放后，徐松一才给子女们讲述油坊的故事：当年油坊仓库里存放着好多袋子北海币和银元。那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军区、滨海军区的部队军饷，管理十分严密。

村里88岁的退休干部徐广平同志回忆：1945年春节前可热闹啦。军民联合搞卫生大扫除，村里村外一直到胡家庄村北，土堆、粪堆、草垛都进行清理，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大店来了200多人，打着红旗、锣鼓喧天，有高跷队、秧歌队，还有群众抬着整猪整羊前来慰问。春节期间村里搭了两个大台子，村东南角一处，村十字街口西边一处。正月初一，在军民联欢大会上，黎玉同志讲话，掌声雷动，一片热烈团结的气氛。事后才知道这是山东省第二次行政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是一次准备反攻、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会议。于1944年8月6日在坪上开始，8月8日转移到大曲流河村，时间不长转到小山前村，1945年正月初六在小山前村胜利闭幕。会议由整风学习，交流经验，总结工作，领导干部分配工作等，参加会议的有滨海区各行署（后改为专署），各县负责人和全省的主任、专员、县长、省行政委员会机关共200多人，会议整整开了半年时间。

安全保卫第一道防线由八路军一一五师及滨海军区抽调专门人员负责。第二道防

线是人民群众，筵宾区多次召开会议，落实措施，区长杨从仁专门负责，以区中队为主，落实“区联防，村站岗”制度，村实行“内紧外松”，夜间民兵站岗巡逻，白天妇女救会、识字班划分几个小组轮流到街头、村头，一边做针线，一边注意来人动向；儿童团也到村外查路条，区中队到各处查岗，形成一个安全网络，保证了驻村北海银行机关的安全和大会的胜利召开。

讲起那段历史，还出现过一件不幸的事，驻石泉湖村印钞厂有一青年职工盗窃北海币，通过审理，在小山前村东边舍林子被执行枪决。

四、跟着共产党，翻身求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共同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13日午夜生效。但国民党军队仍不断在各地制造军事冲突，继而发起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集中国国民党军队20万人，分数路对解放区发放了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

1946年12月工作重点转入支援前线。莒南县委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县45万人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成立了支前指挥部，县长高风林任指挥，县委书记杨心培任政委，响亮提出队伍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号召，积极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车轮滚滚，担架如流，磨碾飞转，人欢马叫，一派宏伟壮阔的支前景象。

在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三年里，小山前村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参战和踊跃出夫支前，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共136人。

在青年徐珍斋和徐宽一、徐恒堂带动下，又一批青壮年参加解放军。谁当兵谁光荣，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全村光荣，村里的妇女、识字班动员亲人当兵，出夫支前形成了高潮和时尚。未上前线的村民们、妇女们担负起碾米、磨面、做军鞋等后勤供应工作，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支援前线的洪流不可阻挡。

小山前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徐占刚，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的侄子徐广勤翻身不忘本，积极参军，在部队成长为一名师级干部。徐广勤和徐广友被编入莒南县军事人物书中。

1947年7月份大区划乡，将17个区划归10个区、60个乡，筵宾区撤销，小山前村划归兰墩乡，归路镇区管辖。1948年9月14日全县组织了5个区的1600人组成运输队，500辆小车，民政科刘希硅（龙掌人）和县公安局政委杨乐斋带队，一区路镇徐言仁和徐广运带队320人组成3个连，一连李义丰负责，二连徐广侠负责，三连韩贵山负责。当时路镇区委书记王黎山、副书记聂帮清（大山前村人）。集合的第二天，莒南县又组织了一批担架队2040人，两批共3640人，组成担运团，分为5个营，由县委宣传部长葛仲昌任团政委，银行行长韩希盈任团长，1948年9月16日，担架团从十字路正式开往前线，增援济南战役。济南战役结束后，接着参加了10月10日解放临沂战役和淮海战役，历经5个月的时间，随华东野战军二纵转战4个省，圆满完成任务。在华东支前司令部召开的检阅大会上，莒南担架团被授予“钢铁担架团”光荣称号，奖锦旗一面，1949年1月2日凯旋。路镇3个连都立功受奖，小山前村徐言仁是二连的，他是淮海战役中在碾庄战场向前沿阵地送弹药被敌机扔的炸弹负伤的，荣立二等功。

小山前村徐占贵是一位开朗活泼的人，爱讲历史故事和抗战故事，他80多岁健在时，还到集市买把二胡跟着村宣传队上台演出。他常向大家讲：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的人。女儿徐广庆、侄女徐广爱、二侄徐广友、四弟徐富上都参加了八路军，我和三弟在家放哨站岗巡逻，白天起早贪黑干农活，一有任务就背起搭子（是一种袋子，背

在肩上赶集用)外出,家中娘们(妻子)常埋怨我好赶集,不顾家的人,实际上我是区里安排负责11个村的联络员,工作忙着哩!

在解放战争时期,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经历了3个月、8个月、5个月的支前工作,当时村干部轮流带队,大多数青壮年要求连续出夫支前。那8个月的出夫支前是难以忘怀的,上了年纪的人都亲自经历过。1947年1月7日十字路万人集会庆祝鲁南战役大捷,筵宾区11名民兵立功受奖,当月29日筵宾区在马棚官庄村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召开5000人的大会,欢迎从前线胜利归来的支前子弟兵团第三中队。区长徐恒举(1945年12月任职至1947年2月)宣布给11名子弟兵记功,并发了奖,会议壮观隆重,影响很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紧跟共产党,万众一心打老蒋!形成参军参战,出夫支前的高潮,2月11日莒南县委对筵宾区发布一号嘉奖令,县委决定:对区委会和在这次支前工作中有功的干部各记功一次。小山前村沸腾了,青壮年纷纷表决心,奋勇报名出夫支前,为人民立功,为全村争光。一时间报名出夫支前达100多人,最后选出32人,于1947年4月中旬莒南随军担架队6000人于大店集结,县委宣传部长王建英带队跟随华东野战军二纵部队服务。11月担运队凯旋,共8个月,历经孟良崮、南麻、临朐、诸城、昌南等战役,从11月17日起分批荣归。98%干部队员立功,被纵队授予“铜铁担架运输队”和“支前模范”锦旗一面。小山前村徐常一是连长,荣获“支前模范连”奖状,这是全村支前民工的荣誉,也是全村全区的光荣。这8个月的出夫支前,困难艰苦危险也是最大的,也是最光荣的和自豪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徐广辉也证实:前几年我们村党支部给老干部登记时,亲眼看到老民兵连长徐常一保存的“支前模范连”奖状,上面盖有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陈毅的印章,解放后徐常一任大店小官庄管理区书记。

解放战争胜利后,许多村干部参加了县委工作队,调出工作。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广大地区,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垮台。4月29日山东分局抽掉22968人随军南下,6月25日华东局根据中央6月1日关于由华东地区再抽1200名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小山前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徐占刚、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徐知斋,还有徐清斋、徐田一、徐言华、徐成镇等被分别调到江苏、牛山、杭州、济南、南麻等地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在莒南小山前村工作战斗过的老干部老领导杨心培、狄生、辛玮携夫人于1984年10月26日来看望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下、筵宾区的老区长、老战友杨从仁夫妇,南征北战喜相逢,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当年艰苦奋斗的难忘岁月,都无限感慨,表示牢记革命传统,为建设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红小鬼讲的故事

王宗富

1941年，八路军一一五师所属的老四团开辟了苏鲁边界的沭河两岸根据地后，就在这一带（现山东临沭县的店头镇、石门镇、曹庄镇、大兴镇、青云镇一带，江苏东海县的石梁河镇、李埝乡、山左口乡，以及赣榆县的班庄镇、大岭镇等地方）住了下来。老四团的指战员不少都参加过长征，我爷爷王太忠当时是沭河县大队的一名班长，和老四团的指战员们都很熟悉，听他们讲过不少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下面就是老家在江西于都的一位外号叫大耳朵的李排长讲的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一双布条鞋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过茫无人烟的大草地。这草地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得那么可爱，而是险象环生。川西的这片广漠的大草地上，河道迂回曲折，河叉纵横，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为令人可怖的沼泽。草甸之下，积水泛着水泡，气味难闻，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灭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林木，鸟兽绝迹。没有村落，没有道路，没有一点儿生气。我当时还是红小鬼，年仅16岁，是连里的司号员。我所在的红一方面军通过草地的时候，正值雨季。脚须踏着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行。出发前连长反复告诉我们，若遇周围是草中间是泥和水的地方，千万要避开。因为每走一步都得费劲，所以大家累得都比较厉害，气喘吁吁，谁都不愿多说一句话。正走之间，头上来了一片乌云，突然下雨了，两眼模糊起来，不知怎么的，我的一只脚从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要往那边倒下去，我急得哭了起来。走在我后面的老班长一把抱住了我的两个膀子，大声说不要慌，他叫后面的人往后拽着他的腿，



他趴下来，快速地把我的那条腿往上拔，他问我痛不痛，我说有点痛，他说你要忍住。他挖挖腿周围的泥，又使劲往上提，这样反反复复，终于把我那条腿给拽了出来。我和老班长都成了泥猴子，大家都说好险，走路可得注意了。我爬起来走了几步，那条腿有些发麻，走路有些不作主了，老班长便叫我扶着他的肩膀走。谁知我那只脚上的鞋子也陷进了泥里，一只脚上有鞋，一只脚上没有鞋，走路很不得劲，我干脆把那只鞋子也脱了下来。老班长说，伢子脚板嫩，这两天泥地，脚板可不能再划破了，便脱下自己的草鞋叫我穿上。我不穿，他火了，大声说，你这伢子，怎么不听话，我的脚已磨成了铁脚板，你能跟我比么，快穿上……剩下的那只可不能扔了，搁起来，会有用的。

晚上宿营时，老班长把他贴身穿的那件褂子的两只袖子及衣领撕了下来，撕成布条条，又把布条条搓成一根根绳子。老班长用绳子量了量我的脚，开始编织布条鞋。他糙裂的大手很巧很灵活，布条绳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两只鞋底便做好了。他又在鞋底上编出后跟，系牢鞋襻，一双挺结实的布条鞋便做成了。老班长对我说，这双你穿，你脚上的那双虽然旧了，但我穿习惯了，舍不得给你呢！

老班长撕的那件褂子我挺熟悉，那是临离开苏区时他媳妇专门给他做的，蓝士林布的，挺厚挺结实的。谈起这件褂子，老班长很自豪，很得意，说我王二喜真是有福气，摊了个好媳妇，这褂子穿在身上，很舒服，很暖和，很有劲。没想到为了我，他竟撕得褂子面目全非。临穿鞋时，我流下了眼泪，他说伢子，不要这样，等你嫂子知道了一件褂子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高兴还来不及呢。

穿着布条鞋，我感到脚上有了力量，我跟着部队，顺利地走出了草地。而我的军号也越来越响亮，激励着我们的连队，如滚滚铁流，奔向陕北……

拼刺刀

为了共同抗日，我们红一方面军编入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红军的威名便使鬼子闻风丧胆。

1937年9月25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战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平型关附近，当时我们的部队在平型关附近的一条长长的山沟里已埋伏好，占据了公路两边的有利地形。战斗一打响，骄横的不可一世的鬼子便被打得晕头转向，人仰马翻，汽车、摩托车相互碰撞，不知所以……冲锋的号角响了，老班长当时已是排长，他带着部队从掩体后面冲出来时，告诉我，小鬼，你虽有个头，但没有劲，拼不动刺刀，你自己要灵活点，见机行事。此时没被消灭的鬼子已清醒过来，开始了反扑，长长的山沟内，杀声一片，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一个胖鬼子企图偷偷抢夺我身后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端着刺刀往那边跑去，趁他没有发现我，我便急忙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的草丛里趴了下来，待他过去，我急忙拾起一块石头，朝他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下去，胖鬼子应声倒地。而正在这当口，我看见老班长正在右边和一个鬼子拼刺刀，由于不小心，老班长胳膊受伤，跌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我急忙跑上去，抱住那鬼子的一条腿，用尽平生力气，猛地往上一掀，鬼子打了一个趔趄，而老班长趁势而起，把刺刀插进了鬼子的后背……一鼓作气，我和老班长又干倒了两个敌人。

战斗胜利结束，取得了大捷，我还受到了表扬。我悄悄对老班长说，咱们是从江西过来的，千难万险都不怕，金沙江、大渡河都不在话下，雪山草地都给让路，鬼子在咱们手里迟早得完蛋。老班长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你李小虎呀，真的是长大了，成了一只真正的小老虎呢！

铁军大帐追歌行 (九)

——新四军军部寻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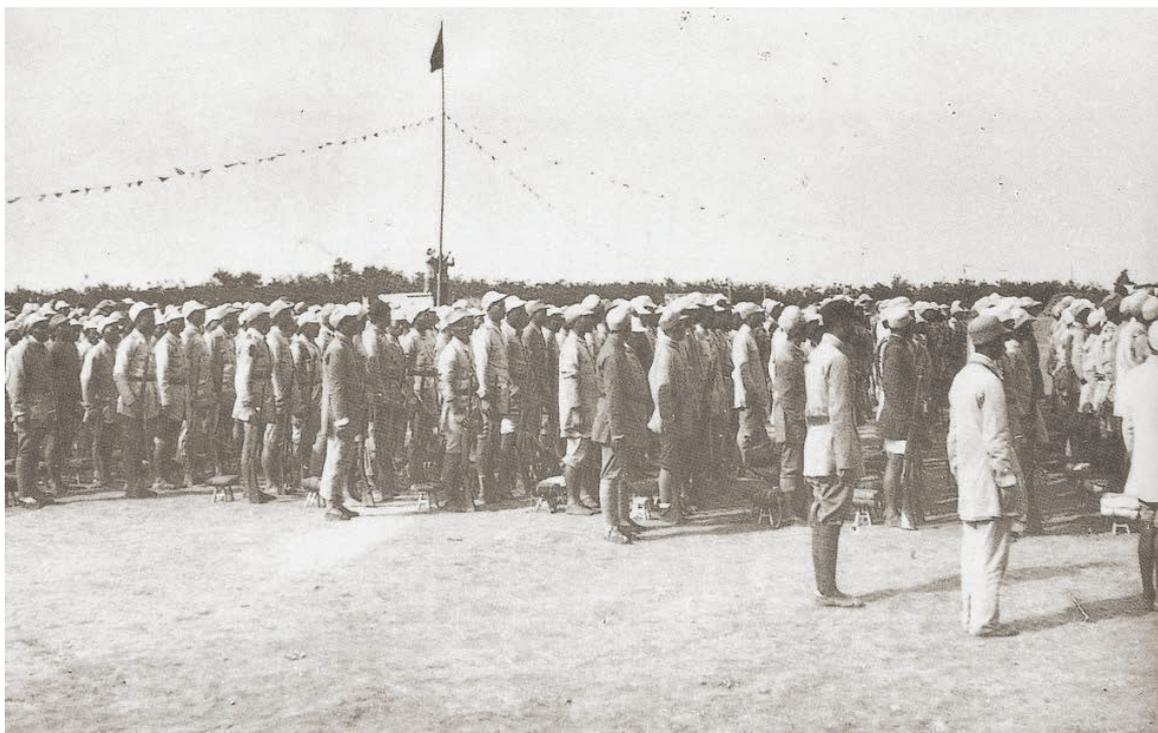
刘凤才

淮南千棵柳——胜利大反攻

(1945年2月28日——1945年9月19日)

1945年2月28日，新四军军部迁至江苏盱眙县东南约50公里的葛家港千棵柳村（今旧铺镇千柳村）；4月10日迁至淮南津浦路西的大赵庄，24日再度移驻千棵柳。

此村位于苏皖中交界处，与黄花塘在同一南北交通干线上，相距不过20公里左右。据记载，新四军军部在此地驻留半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但是，军部为何迁到此处，没有史料作出解释；在此期间，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也没有特别记载。也有的资料记载，从黄花塘移驻千棵柳村的只是新四军军部司令部。从时间上看，正是新四军抗战从局部攻势作战，到贯彻中央作出的北上南下西进战略部署，到全面抗战最后胜利的阶段。此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21万余人。



新四军大反攻誓师大会

6月初，我们冒着阵阵雷雨，从黄花塘驱车赶到千棵柳，一路之上，直到村中，我们睁大眼睛，仔细询查，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新四军军部的“雪泥鸿印”、红色遗存，问及数位村人，也不知有新四军军部在本村驻过的历史或者故事。在村中反复落实，挂着“旧铺镇千柳村党总支”“村委会”牌子的村，确实就是千棵柳村，附近并无第二个叫千棵柳的地方。据说当年村里确实有千株柳树、沿路成行、柳荫盖地、垂绦缕缕之景，只是后来日寇进攻时，一把大火焚烧村庄，千万棵柳树也随之付之一炬，再不成景，也无旧痕了。千棵柳虽已无痕，新四军有不朽之战绩。在此期间，在军部领导下，有两次大的战事，显示了全面进行攻势作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新四军的日益强大与卓著功勋。

一、苏北攻城第一战，阜宁大捷显军威

自1944年3月，粟裕率领的第一师进行了车桥战役，拉开了新四军开展局部攻势作战的序幕后，新四军各部群起响应，攻势连连，捷报频传。第三师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指挥下，于四五月间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抗战局面。为阻止新四军在苏北的攻势，日伪慌忙将原在河南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东调苏北。11月，逆贼孙良诚率1.6万伪军一到苏北，即配合日军对我进行大“扫荡”。新四军第三师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英勇迎敌，给了孙良诚迎头痛击，孙部吓得只得龟缩到阜宁、盐城一隅。

孙逆虽然没有多大战斗力，但这么一大坨敌人集中在苏北地区，毕竟成了我们的心腹之患。早在军部尚驻黄花塘时，军部便对孙良诚部制定了“打拉并用”的方针。12月30日，张云逸、饶漱石就曾致电一、三师：“如果你们确实了解了他内部的虚实，并摸实了他的脾气，则在军事上给他有效的打击是需要的。只要你们有机会与可能又确有胜利把握时，必须给孙逆以各种政治与军事的打击。”

1945年4月中旬，盐阜地区召开参议会，与会各界抗战代表人士纷纷要求第三师乘攻势作战东风，集中兵力，尽快发起攻打阜宁县城的战役，除掉孙良诚这个祸患。4月15日，参加会议的第三师参谋长洪学智一回到师部，便迫不及待地大家的呼声汇报给了师长黄克诚。这正中黄克诚的“下怀”，他也早有此意，只是阜宁县城的情况有些特殊，他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阜宁县城北接连云港，南通盐城，西临淮涟，东濒黄海，是盐阜地区的军事重地，经济中心，也是日伪军还留在我根据地中的一个钉子。如果能打下阜宁，必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政治、军事、社会影响。但驻守阜宁的是孙良诚部第五军，总计5600多人，而且县城防守工事十分严密，护城河、外壕、铁丝网层层密布，城里巷战工事与掩体也十分密集坚固，大小据点共有20多个，易守难攻。敌军长王清翰曾多次夸下海口，阜宁县城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特别是攻打阜宁，这是我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第一次攻城作战，以前没有经验。真要打下阜宁县城，意义重大非凡，除了决心，更需要周密的计划与部署，决不可轻敌。而这些，洪学智这个参谋长也早作了一些准备，言之凿凿地向师长表示：“师长放心，打下阜宁，我有把握！”

黄克诚召集师部作战会议，很快制定了具体而可靠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兵力，共组织11个团参加战役，一鼓作气，坚决果断，誓夺苏北攻城第一战的胜利。4月24日夜晚，攻城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拿下了阜宁外围各个据点。25日15时，全线发起进攻，至26日10时，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守敌近3000人，敌军长王清翰率残部逃窜。

阜宁大捷，社会震动。军部立即发来了嘉奖电报，其中特别表扬八旅二十二团

“善于机动扩大战果进占阜宁”。

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也专门报道了新四军第三师收复阜宁城的消息，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二、冲锋号声遍华中，胜利凯歌震江淮

1945年8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时刻。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0日24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大反攻的第一号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否则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新四军军部即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

朱总司令8月11号24时发布关于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命令，谅各地均已收到。我军执行此命令，各部队应注意各项如次：

一、对各地区之敌伪，首先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如伪军家属，亲友，商人原有工作关系，日军俘虏等）派去劝说投降缴械，但自己干部未到一定时期不宜随便派出，免遭意外，并须提高警惕。

二、各地主力部队，应相当集结，不要分散，以便选择该区一二个主要拒绝投降之顽化伪军，给予坚决的歼灭，以达到威逼其他次要敌伪据点就范。

三、对其他次要敌伪据点，应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民兵、地方自卫武装实行围困，配合地方主力以军事威力达到政治争取和解决之目的。

四、凡自愿对我缴械之敌军，应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凡自愿投我之伪军，应给以三大保证。此点如执行不好，可能引起敌伪反感和决心反我。

五、朱总司令命令应以传单布告方式广为散发。各部队接此命令后，应按当地具体情况部署实行为要。



新四军解放阜宁
祝捷大会

同日，新华社发表了新四军军部致华中各地日军通牒的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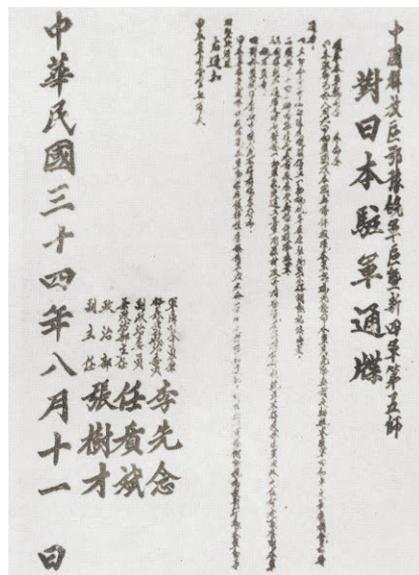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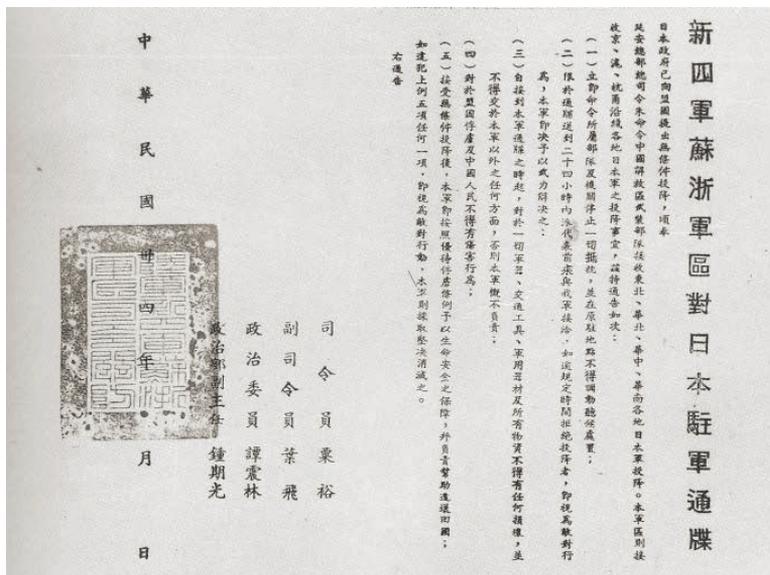
- 一、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驻地听候处置；
- 二、将一切武器、交通工具、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于二十四小时内全部交与就近之本军部队，不得有任何损坏，亦不得交与本军以外任何方面；
- 三、对中国人民及盟国俘虏不得有任何损害行为；
- 四、即派代表到就近本军部队接洽。

在日军遵行上列诸项后，本军即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以生命安全之保障。如违反上列任何一项，即视为敌对行为，本军予以坚决消灭。

当时，全党全军对进行大反攻早已极为渴盼，热情特高，完全可以理解缺少了几分冷静。就在10日这天，中共中央曾致电华中局，就新四军反攻作战的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甚至作出了具体部署，如要求“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军部应于即日发布上海、南京两个市长任命”等等。对于大反攻早已迫不及待的各部，接到命令后刻不容缓，火速行动，如苏浙军区曾一度当即派兵去夺取上海，叶飞率领第四纵队横渡太湖，向上海进军，拟配合上海地下军起义，并任上海起义军总指挥等，大有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之态势。

但是，中央随即冷静下来。考虑到华中日伪军肯定拒绝向我投降，国民党必然与我争夺大城市，根据目前力量对比，我们夺取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是不现实的，于是立即调整了作战方针，于12日再次致电华中局，指出：“江南力量就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争取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同一天，在延安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华中局的电报，对新四军的战略反攻做出了具体部署，对各部队任务作了区分，并提出新四军军部应“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接到中央及军委的电示后，军部领导人认为这些方针与部署意见，完全符合华中敌后实际，遂于13日转发各师、各军区，命令各部遵照执行。已经在登船之际、出兵“夺取上海”的四纵，也迅即停止了这次冒险行动。同时，为加强进攻力量和野战机动作战能力，军部决定各主力师、旅不再兼任军区、军分区，并要求各军区、军分区尽量抽调地方武装组成新的主力兵团，注意帮助主力兵团补充兵员等。



新四军各师发表的通牒

根据中央和军部的方针和部署，新四军各部迅速展开了对日伪军的全面反攻作战，积极主动地夺取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一时之间，在黄海之滨，大江南北，津浦线东西，淮、运河两岸，太湖、洪泽湖畔，整个华中大地到处吹响了向日军发动最后进攻的冲锋号声，胜利捷报接踵而来。到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在20多天时间里，新四军共收复县城33座，攻克集镇400多个，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最大程度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成果。

三、铁拳直捣伪贼巢，两淮城头红旗飘

抗战时期，日寇培植发展的“伪军”，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治华”恶毒策略的特殊产物。日军投降时，盘踞在各地的伪军尚有百余万人，数量十分庞大。而如何处置伪军，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伪军本来多数就是游杂武装、乌合之众，他们唯一的信奉是“有奶就是娘”。日寇投降后，许多伪军立即改头换面，投靠了国民党，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拒绝向我投降。而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也对他们采取了收编、收买等做法，命令伪军改旗易帜，充当爪牙。当然，在伪军当中，也有一些人为保命与生计所迫，并非心甘情愿地为日寇当走狗帮凶。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争取国内和平，对伪军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与办法。对冥顽不化、死不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坚决消灭；对放下武器，愿意归顺人民戴罪立功的，欢迎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或者加入我军行列。在我党我军政策感召下，有不少伪军弃暗投明，向我投诚或者举行起义。8月20日，伪空军中校周致和等6人驾驶汪精卫的座机“建国号”，从扬州起飞，降落在延安，投向我方，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与反响。为了吸引更多伪空军投诚，中共中央还专门致电华中局，告诉他们延安机场足可容纳20架飞机，如有再来投诚的飞机，到时机场画有白十字符号以为联络标识。

当时在苏皖解放区内，淮阴、淮安、盐城、高邮、扬州等中心县城，还控制在伪军手中。如果不尽快消灭这些伪军，解放主要县城，将给苏皖解放区留下极大后患。对此，新四军军部亦早有考虑。还在8月17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就致电苏中军区和第三师，指出：“苏中主力部队不宜分散使用，集中力量首先解决伪军，或迫其投降缴械。”而“两淮战役”，就是新四军最后歼灭这些伪军的重要战役。

“两淮”即淮阴和淮安两城。二城相距只有17公里，紧靠运河，同为历史古城，是苏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侵占后，成为其屯兵据守的要地，同时也成为分割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日军投降后，淮阴城由伪军第二十八师盘踞。师长潘干臣是铁杆汉奸，不但拒绝向我军投降，反而残忍地杀害了我前去送“最后通牒”的新四军信使，并转而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改编为国民党第六路军第二十八师。为此，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三师，坚决砸碎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三师首先由第十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底攻克了淮阴城外圈的全部据点，将其团团包围。随后，第七、八旅加入攻城作战，于9月6日向淮阴城中的瓮中之鳖潘干臣发起了最后进攻。

夜战是我军的特长与传统。与以往攻城作战不同的是，第三师这次攻打淮阴城，却偏偏选择在了白天，其一是我军已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坚拔寨的实力，其二是出其不意。经过侦察，发现潘干臣对我军的战法还有一定了解，故夜间戒备很严，白天比较松懈。因此，我部从早晨就开始对淮阴城实施炮击，一直持续到中

午，炮火时紧时松，断断续续，却总没有部队向前冲。守城的伪军误以为我军还是老一套，先把他们围起来，等到夜间再进攻，因此高度紧张的神经开始慢慢地松弛下来。不料，就在下午13点55分，我军猛烈、集中、持续的炮火却像不歇的怒火雷霆，一股脑儿一个劲地向淮阴城砸来。攻打城东门的部队，把一枚重达1000磅的炸弹，通过事先掘好的壕沟直接送到了城墙之下，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冲天烟尘，守敌1个连的人员全部被震昏，城墙被炸开了一个数米宽的缺口，新四军战士如旋风掠阵，仅用5分钟就攻上了城头，冲进了城中。而攻打南门的师特务团却遭到了敌人猛烈火力的阻抗，尖刀班班长徐佳标第一个登上城墙，不幸身负重伤。他看到敌人的一个暗堡中的机枪正在向进攻的战士们狂射，便咬紧牙关，用生命的最后一股力量，支撑起身体，一下扑到敌人的暗堡射孔。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友们呼啸着冲上城头。

最后的攻城战斗总共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军全歼守敌8600多人，击毙伪师长潘干臣。战后，徐佳标被追授为“淮阴战斗英雄”，其所在班被命名为“佳标班”。淮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把南城门命名为“佳标门”。陈毅代军长欣闻捷报，专门发来了嘉奖电：“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用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击毙敌首，解放淮阴城，为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创造了条件。殊堪嘉奖。”

另一个伪军重要据点，是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淮安”。三师攻克淮阴之后不久的9月22日，由师参谋长洪学智亲自指挥，第7、8旅携手作战，将其一举攻克，歼敌4000多人。“铁打的淮安”在钢铁的新四军面前，瞬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新四军攻克的淮安城



模范政委吴岱 (上)

佚名



吴岱（左）与战友

先敬人才能团结人

吴岱（1918.11—1996.11），福建省长汀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顾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郟城战役后，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编，实行精兵简政。这次整编精简机构，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取消了旅的建制，充实连队。四团变动较大，与教五旅的十五团、山东纵队的二旅五团等3个团的部队合编，山东纵队二旅五团4个连编为二营，教五旅十五团5个连与教二旅四团一、三营合编，干部降职使用。原教五旅政委任四团团团长；原四团团团长贺健任参谋长；原四团参谋长贾正远任一营营长；原十五团政委宴成山任教导员；原山东纵队二旅五团团团长毛会议任二营营长；原五团政治处主任谢永胜任教导员；原十五团副团长郭廷万任三营营长；原四团政治处副主任钟生栋任教导员（不久又有变动）。只有吴岱仍任四团政委，王树君仍任主任。

这些部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辉战斗历程、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3个团合编在一起，使四团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力量，也同时产生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其中首要的是团结问题。吴岱在处理这个问题

中，表现了他的创造性，既讲原则又实事求是。

很多人都说吴政委平易近人，从来不发脾气，这是搞好团结的重要条件。所以，吴岱从当战士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关系都很融洽。解放战争时，他在东北任一师政委，在师、团工作的同志都觉得工作顺心、痛快，这不能不说是他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在处理各种关系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发挥的作用。其中第三次整编后，四团的团结工作是个重要阶段。

人们常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吴岱说这个话缺乏主动性。不会尊重人的人，就不能团结人。要主动团结人，必须先敬人，变“你敬我一尺”为“我敬你一尺”。革命同志，政治上目标一致，在团结的问题上，要把自己放在主要方面，是革命同志，我就尊重他，能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你的官再大，本事再高，只要不尊重别人，人们就离你远远的，“我惹不起你，躲得起你”。

整编后，首先是处理好和团长的关系。团长原是旅的政委，到四团带来两个警卫员，两匹马。按编制，团长配一个警卫员，一匹马。吴政委既要坚持原则，按编制办事，又要实事求是，不使“旅政委”因变化太大而不习惯，影响工作，就主动征求团长的意见，给他留下一个警卫员，一匹马，把另一个警卫员编到警卫班，并且交待说，你的任务主要是警卫团长，照顾好团长的生活。其他警卫员也都知道政委的这个安排，执行起来，没有阻力。把另一匹马编到骑兵班，向骑兵班长交待，团长要出发，这匹马一定要跟上团长。按规定，团里可以开小灶，过去四团没有开，因为团的干部经常不守在团里。罗团长来了，吴政委向管理人员交待，团长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要保证他的健康，开小灶。这样，首先是生活上使团长觉得变化不大。吴岱在工作上更是尊重团长，他对团长说，你是旅政委，军政工作都很熟。我建议四团军政委员会主任由你担任。团长很谦虚，他说，按习惯，军政委员会主任由政委担任，你就别推辞了。但是，吴岱在上报军区时仍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只是军区没有批准，吴岱继续担任四团军政委员会主任。

吴岱经常下连队，生活在连、营，遇到一个营单独执行任务时，多数是政委随部队去完成，相比之下，团长留在团部的时间较多，部队对团长有些意见。吴岱听到反映，就主动做解释工作，说团长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我年轻，不能要求团长和我一样。

郟城战斗后，升任二营副营长的鄢思甲，作战很勇敢，性格直率，好叨咕，有时还发牢骚，常说在八路军，轻快的活没有，要是叫我挑，行军的时候，我愿意当马夫，有马骑，宿营的时候，我愿意当挑夫，也不用挑东西。

这话叫团长听见了，批评他没有原则。

鄢思甲嘻皮笑脸地说，团长，我没有原则，你就把我这个副营长撤了吧，叫我去当马夫、挑夫。把团长气得够呛。

吴岱知道了，批评鄢思甲。四团的人都知道政委从来不发脾气，他也不敢在吴政委面前“调皮”，和孩子见了父亲一样，小声嘟囔着说是闹着玩的。吴岱严肃地说，当副营长了，怎么能跟团长开这样的玩笑，这是对团长不尊重。

有一次要去拔伪军的一个小据点，吴岱建议叫鄢思甲带四连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团长对鄢思甲印象不好，不放心，就跟四连一起出发了。四连把敌人包围起来，动作慢了一点，团长骂开了。因为四连连长叫勾振兴，团长说，什么勾振兴，是个“狗熊”。四连连长找鄢思甲，说我是狗熊，找不是狗熊的来打吧！鄢思甲说，团长说你是“狗熊”，你就当“狗熊”？拔不下据点，你不是“狗熊”是什么？去，把据点拔了，当个英雄。鄢思甲又和四连长一起布置了兵力、火力。战

斗打响了，勾振兴带着四连冲上去了，他向伪军喊话，老四团来了，快投降吧。伪军听说是老四团，无心恋战，一枪没放就往大据点里撤，正好中了四连的埋伏，不到半小时，捉了20多个俘虏，四连一个伤亡也没有。战斗结束，勾振兴向团长报告说：“狗熊”完成了任务。团长高兴地说，你不是“狗熊”，是个英雄。以后团长也改变了对鄢思甲的看法。

参谋长贺健，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有一次在球场上和团长干起来了，吴岱批评他说，你是四团的老人，怎么能带这个头？贺健说，他放不下首长的架子，我看不上。吴岱说，旅政委当团长你看不上，这不是骄傲和自大吗？对团长有意见，可以在团的干部会上提出来，怎么能在战士面前顶起来？吴岱又说，毛主席说过当地的干部与外来的干部不团结，当地干部要负主要责任，我这个政委也没当好，没有执行好毛主席这个指示，对原来四团的同志要求不严，我建议你主动找团长谈谈，多作自我批评。

经过多方面做工作，四团再没有发生不团结的事情。

精兵简政以后，四团的老兵相对增加了，在一个时期，吴岱集中精力抓了老兵的思想工作。四团最老的战士叫黄木生，1930年入伍，曾当过教二旅副旅长张仁初的副班长，现在是五连二排的班长，人很老实，就是能力很低。他有个特点：慢。说话慢，吃饭慢，就是打个背包也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大家开玩笑叫他木头，这样的班长领导的班，当然也紧张不起来，成为五连最落后的班。二排长很烦他，有一次集合晚了，排长吼了他几句。他火了，说我是井冈山下来的，我的兵都当了副旅长，你还吼我。排长也在气头上，说井冈山的骡子，还得驮重机枪，你摆什么老资格？两个人打起来了。

吴岱先找二排长谈话，批评他，你怎么能把红军老同志比做井冈山的骡子？他又找黄木生同志征求意见。黄木生很有自知之明，说政委，我没有领导能力，我自己都管不好，给我换个工作吧。

吴岱问他干点什么好？黄木生说去养猪。

吴岱说，当前很困难。生产也是大事，你要愿意，答应你的要求。黄木生养猪确实能干，养了两头母猪，下了20个小猪。



滨海军区大练兵

四团的老兵工作，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教二旅有个教导队，把一些经过战斗锻炼、工作又好的老战士集中起来，准备经过训练后提为副排长。第三次整编，很多连队两个连合成一个连，干部多了，这些老兵就提不起来，把他们编到四团特务连，成为一个排。这些准备当干部的老战士，和新兵一样，也要站大岗。老兵在新兵中，个个是骨干。他们集中在一起，就不显山露水，谁也不比谁强，开始是自由散漫，内务卫生不如别的排。发展下去，打架斗殴的，装病压床板的就出现了。班长管不了战士，排长管不了班长，竟连站岗的也派不下去了，连的干部也束手无策。吴岱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团里开座谈会。可这些老同志却准备到团里大闹一场。

开会那天，会场设在村里小学的教室里，吴岱和王主任、组织股长、组织干事都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

吴岱站在最前面。进来了头一个，吴岱说，你好哇！刘志贵同志。

刘志贵说，政委还能记住我的名字？

吴岱说，我还知道你家是山西省长子县张店村的，对不对？

刘志贵说，对！

吴岱说，在晋西北的磊上战斗，你还缴了鬼子一支三八大盖吧？

刘志贵说，政委，多年的事，你还没忘啊。

吴岱说，你是战斗骨干，部队的宝贝，怎么能忘了啊。

二十几个人，吴岱都能叫出名字，说出特长。想想一个团，两三千人，政委能记得住自己的名字，还能说出自己的成绩，是一个战士连想也不敢想的最大满足。想大闹一场的人，也就拉不下脸了。

吴岱以道理统帅事实，以事实说明道理。他说，毛主席说抗战分三个阶段。防御阶段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我过去以为到了相持阶段，困难会少些，实际不是这样，鬼子已经没有力量像抗战初期那样向中国大举进攻了，可是在敌后的“扫荡”比抗战初期多，又是“囚笼政策”，又是“铁壁合围”，给敌后抗战增加了困难。在防御阶段的两年中，八路军、新四军由5万人扩大到50万人。可是现在，我们又由50万人缩小到40万人。我们四团是1938年由两个连发展起来的，那个时候，战士当排长，排长当连长，干部还是缺不少。现在四团是由4个单位合编起来的，干部多到用不了啦。你们看，我们团长，是旅政委下来的，原来四团团长了副团长，营长当了连长，连长当了排长。你们都是经过战争锻炼出来的老同志，过去工作战斗都很好，要是处在发展时期，当副排长、排长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一个排也不能配两三个副排长呀！把你们都压在这里，我看也真可惜，可是没有办法，你们帮我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吧。

吴岱又问了几个同志，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吴岱又说，当前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困难，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过了高山，就是平地，我们现在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把你们集中起来，就是保存骨干，待到条件成熟，我们革命力量还会象抗战初期那样来个大发展。到那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干部，你们就都会有用武之地了。抗战要积蓄力量，你们每个同志也要积蓄力量，抓紧时间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武装自己，长一身本事，好在反攻中大显身手。

吴岱把话锋一转，说革命有高潮，有低潮，有人在高潮中经不起考验，犯错误，也有的人在低潮中经不起考验丧失信心，更容易犯错误。我们要放眼向前看，和爬山一样，快到山顶，累得很，可是鼓鼓劲就攀上去了，减了劲就滑下来了。吴岱问大家，我们是鼓劲往上爬呢还是泄了气往下滑呢？

老同志齐声回答，一定要鼓劲往上爬。

老同志终究是老同志，基础好，觉悟高。吴岱的一席话给他们拨开了云雾。刘志贵首先站起来自我批评，说自己眼光短浅，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捣乱”了。一时，呼啦一下，全排的人都站起来，向政委表态。

吴岱说，别急，吃了饭再走，没有好吃的，团部为你们准备了面条。在艰苦的环境中，吃顿面条也很不容易。老兵们回到连队，有人就开玩笑说，老兵的心，都叫政委的面条拴在一起了。

困难不仅来自敌人，还来自大自然。1941年沐河西岸大旱。大粮作物收获只有三四成，有的是颗粒不收。第二年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1942年春天，青黄不接，粮价飞涨，小麦17元1升，花生皮也涨到每50公斤25元钱。部队的供应标准，战士每人每天1公斤粮，1角2分钱的菜金，每月1元钱的津贴费也不能保证，菜金和津贴停发，粮食只能供应一部分，一天由3餐改为2餐，有时一天只能吃1顿饭，甚至不得不以黑豆渣、地瓜蔓烙成煎饼。

要战胜困难，四团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这一年春天，四团全团都进行开荒、生产。开荒时，干部带头，当时四团干部除罗团长外，都是二十几岁，组成一个开荒小组，吴岱当组长，和战士比着干。全团上下都争着当开荒能手，有的人一天开了3分地，全团平均每人开荒2亩。四团组织了150人的生产队，分成5个组：一个种菜组，50人，在河边树林边种菜50多亩，春秋两季收菜2万多公斤，冬白菜够全团吃4个月。二是大田组，60人，仅曹庄、郭庄等村的乱葬岗子，就种了250亩小麦、玉米、黄豆、花生，还有黄烟。乱葬岗子的生地很肥，部队管理得也好，发生蝗灾及时扑灭了，高粱每亩收了250多公斤，是当地最高产量，还收了5万多公斤高粱秆，组织人编了几千张席。黄烟的收成也不坏，每人可分1公斤烟叶，吸烟的战士再也不用拿豆叶、芝麻叶当烟吸了。三是油坊，设在月庄，用自己生产的花生、黄豆榨油，紧张时，70个人干活，除了支援地方政府以外，四团达到每天每人能吃上6钱油。油坊还有养猪的任务，四团最老的红军战士黄木生负责的两头母猪发展成50头猪的大群，黄木生当了猪“司令”。四是运输组，派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搞运输，有4辆大车，6条牛，3头驴，负责把生产组、种菜组的产品运往部队。五是贸易组，抽了15个活动能力强的同志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化装成商人，用花生、大豆到上海、青岛等地为部队换些药品、布匹、肥皂、纸张等，有时还搞些炸药、军火一类的东西。一营还开了个骡马大店，有120多匹牲口。还办了个盐槽子（食盐公司），把沿海盐滩的盐运到外省。

采取这些措施，1942年中，四团每人平均产值680元（北海币），不仅解决了部队一些实际问题，还每人为根据地人民减少10元钱的负担，这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准备大反攻有重要意义。

国家危难时的庄翰林一家人

荣士友

自清朝末年到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沂蒙山区的庄清吉翰林一家人中，先后出现了清末勤政爱民的“庄青天”庄清吉，“五四”运动中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学生领袖庄达中和抗日烽火中的“革命母亲”庄大娘。他们一家人用赤诚爱国之心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庄青天”翰林庄清吉

柏乡好县官，乃有庄青天。
出身翰林院，降心治弹丸。
勤政又爱民，查学遍乡间。
见人有片长，啧啧屡称叹。
到任甫二年，倏忽被倾颠。
谗邪必害正，金壬定嫉贤。
鬼蜮含沙易，宦海行路难。
甘棠留遗爱，愿为造铁船。

这是在1932年刊印的中国方志丛书《柏乡县志》里，记载赞颂翰林庄清吉的一首民间歌谣。

庄清吉（1863—1914），费县方城镇诸满村（现属兰山区）人。庄清吉七岁失母，其父庄曰善以识字不多为憾，但因家贫只好让清吉为富家子弟陪读。庄清吉自幼聪敏好学，光绪十年（1884年）考入县学，中秀才后，为了生计自办私塾以教书为业。光绪十七年（1891年）乡试中举，边教授边苦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京应试，复试第一等第十七名，殿试第二甲第十九名，朝考第一等第七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兴起，庄清吉在乡间多年，深知朝政昏暗，



庄清吉

民不聊生，亦有变革图强的意识。他的座师翁同龢（光绪帝师）对其十分赏识，两人关系甚密，翁同龢曾以藏帖《九成宫》相赠。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翁同龢遭贬回乡，庄清吉也受到牵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降心治弹丸”，庄清吉离开翰林院被外遣到河北省柏乡县任知县。他以“清、慎、勤”三个字激励自身。据中国方志丛书《柏乡县志》记载：庄清吉在任上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先后设立储才馆、蒙养学堂、高等小学堂。考取学生，选派绅士，游历日本，考察学务政治，成立工艺局及劝学所。又每亲理词讼，判断曲直。初到任时，每月词讼数十件，及期年后，政简刑轻，几几有无讼之风焉，为百姓所爱戴。

袁世凯对庄清吉本来就存有芥蒂，他借慈禧太后享用之名要柏乡县送两万斤芝麻。庄清吉用银两购买芝麻后，特地开列了购买所用银两清单，袁世凯看后十分生气，斥庄清吉为不懂时务的“腐儒”。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讹传高邑县复有拳匪蠢动，袁直督（袁世凯）派候补知县赵某到高邑县考察拳匪，赵某乃捏禀柏乡亦有拳匪，对庄清吉予以诬陷。袁直督立将高邑知县及柏乡知县庄清吉撤任。庄清吉去任时，1000多人到北城门外送行，有的还流下了眼泪。柏乡人至今歌颂思之，称为“庄青天”。

庄清吉两袖清风，书画半车，回到故乡养亲教子。1914年不幸染疾，不治身亡，享年51岁。

“五四”运动爱国学生领袖庄达中

庄清吉的家乡诸满村是颜真卿的祖籍，古称“孝悌里”。颜真卿谥封为“鲁郡开国公”，简称“鲁公”，其祖籍建有“鲁公庙”和“鲁公桥”。鲁公至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赤诚报国的精神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庄翰林的家乡人，庄清吉之子庄达中就是踏着“鲁公桥”走出去的“五四”运动杰出的爱国青年学生领袖。

庄达中（1892—1933），自幼受其父变革图强民主思想的熏陶，极富正义感



和爱国情怀。青少年时期曾在临沂政法学校学习，后考入济南商业专科学校。当时的中国处在最黑暗时期，政府昏庸无能，奸臣卖国，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山东青岛，霸占我胶济铁路，庄达中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学生，心中常常愤愤不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庄达中热血沸腾，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进行演讲。5月7日，庄达中参加了在省议会召开的各界国耻纪念大会。大会上群情激昂，人心振奋。此后，济南市各学校的学生会、校友会等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推选庄达中为会长。5月23日，各校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齐集济南演武厅召开大罢课誓师大会。会后学生手举旗帜，散发传单，游行演讲，高呼口号，抵制日货，把爱国运动推向新高潮。6月10日，济南市开始大罢市，各校学生纷纷走进商埠街头，宣传和劝说各商家关门罢市，并结队到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请愿，与反动当局展开坚决斗争。庄达中和全体学生陈情悲壮，义正词严，督军和省长不得不答应向京电达山东人民爱国的正义要求。

6月上旬，济南罢课罢市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山东学生联合会会同省议会等七大团体开会，决定进京请愿。共推举请愿代表83人，其中学生代表有庄达中、张文英、王建兴3人。6月19日，请愿代表带着全省人民的重托，乘车赴京请愿。进京后，受到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拦，代表们意志坚决，夜哭新华门，并发誓若不接见，决不生还。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答应了请愿团的要求。山东请愿团又推选出王乐平、庄达中、王建兴、李子善、张彝伯、张星五等6人面见总统。6月23日，庄达中毫无惧色地站在徐世昌面前，慷慨陈词，历数国耻，痛斥国贼，声泪俱下，精诚所至，感动得执戟卫士纷纷以襟拭泪。徐世昌在代表们的义正词严面前不得不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京期间，庄达中还到北京大学访问山东籍学生，拜访并结识了瞿秋白、李大钊，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1920年，庄达中回沂蒙家乡，看到地方上的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贪污腐化，鱼肉百姓。他就发动蒙山前72个村庄的老百姓联合起来，把反动的诸满社社长邵性太赶走，后来又把费县知县董大年“拉下马”。他积极提倡平民文化，创办了“醒民小学”，自任校长和教员，进行启蒙教育和民主思想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陷，庄达中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在家乡的庙会上，登上戏台演讲，号召乡亲们不做亡国奴，要团结抗日。当讲到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丧，我同胞被日寇奸淫屠杀，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归的惨状时，他悲痛万分，不能自己，竟失声痛哭。台下听者如云，无不为之动容，至今家乡的老人们还能绘声绘色地谈起当时的情景。在日寇铁蹄还没踏进沂蒙山区的8年前，庄达中就在家乡撒播下抗日救国的火种，为以后的山东纵队蒙山抗日独立支队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933年，庄达中得知冯玉祥、吉鸿昌在绥远省固北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后，他抛妻舍子，日夜兼程投奔了共产党员吉鸿昌的部队，任吉鸿昌的参议，为抗日工作日夜操劳，奔走呼号。他经常陪同吉鸿昌赴北京、天津等地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和做抗日统战工作。后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庄达中痛不欲生，加上积劳成疾，突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辞世，终年42岁。

“革命母亲”庄大娘——杨佩范

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红嫂”。同时，在抗击日寇的残酷斗争中，也有许许多多“革命母亲”为救亡运动舍家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庄达



中的夫人杨佩范就是其中之一。

杨佩范（1889—1975），原籍齐东县，因其父杨诞宸任费县教谕落户费县，与庄达中结为连理。她有文化，思想进步，庄达中去世后，秉承丈夫遗愿，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中去。她曾任费东县妇救会会长，经常在大会上讲话，动员支前参军，成为蒙山抗日根据地远近闻名的“庄大娘”。1938年她把16岁的长子送到山东省战工会政治干校学习，1940年她又送次子去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又把三子送到革命队伍里。革命母亲“庄大娘”把自己和孩子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

1941年3月，沂蒙专署成立抗日民主新政权，庄大娘作为妇女代表，她的次子作为青年代表，娘俩一起赴沂南县马牧池村选举专员。为了避开鬼子汉奸的耳目，由民兵张立民推车，庄大娘坐在独轮车上，她的次子拉车，乔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步行三天到达目的地。经过3个小时的投票选举，选出了专员牟宜之、正副议长邵德孚和刘惠民。新政权成立后，为防备敌人袭击，宣布休会，代表立即返回。庄大娘一行三人走出数里，后面枪声响起，她庆幸地说，多亏领导计划周密，不然就让敌人包围了。

庄大娘家还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驻地，当时的山东纵队民运部长朱则民和他的夫人杨军经常住在庄大娘家。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她看到朱部长穿得单薄，就把她丈夫的一件貂皮大衣送给了朱则民。解放后，朱则民把这件貂皮大衣捐献给了灾区。当时，抗日环境特别恶劣，朱则民夫妇刚出生的女儿小青就托付给了庄大娘抚养。四年后庄大娘把革命的后代小青交到朱则民夫妇手里。

1975年，86岁高龄的“革命母亲”庄大娘因病去世，当地政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有人给庄翰林家送了一副对联：满门忠义为救国，光耀千秋励后人。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九)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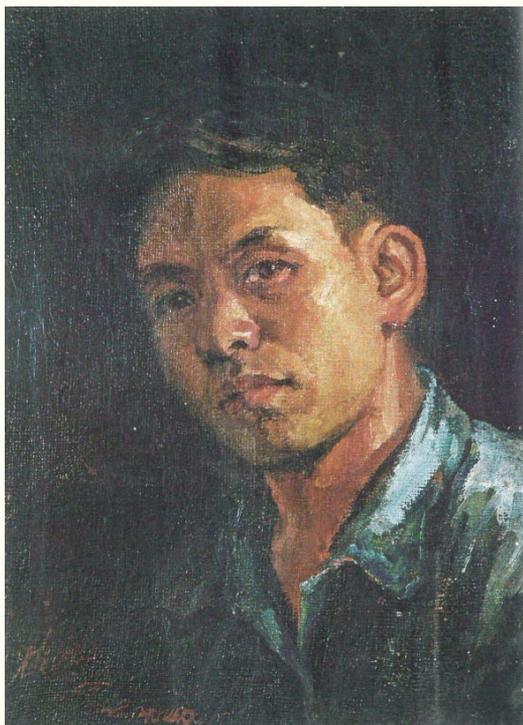
忘我工作全面修养

之先一生的创作谨遵徐悲鸿的师训，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按照他夫人和公子的说法即“他不写生，不动笔”。而要外出写生，短则二三个月，长则半年。所以，为了画画他顾不了家；即使回了家，也是一头钻到画室里关上门，没白没黑地画。

他跑遍全国各地去采风写生，并不像人们游览观光那样享受，那样轻松愉快。因为大部分是带着领导给的任务，或出版社的约稿，都是限时限刻而且要保质保量完成的，没有忘我的拼搏精神是难以完成的。

在深入生活时，他吃住都很艰苦，每次下农村，总是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到莒南洙边采访，没有住处，就和一位70多岁的孤寡老人同睡在一张小床，同盖一床又破又脏的被子，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夏天到山里去，晚上没有蚊帐，就用被单蒙住全身，但蚊子仍旧咬，天明一看，全身是疙瘩。一天到晚在野外写生，没地方吃饭，只好带几个凉馒头或饼干充饥，喝的是水壶里的凉白开。为了避免吃不好闹肚子，就带几片消炎药预备着。

之先的好友作家王火一生创作达上千万字，出书30多本，别人问他原因时，他回答：“我有个巩固的大后方。”意思是夫人贤慧而且健康，在家时是贤内助，出门在外也没有后顾之忧。之先和他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幸运。夫人孙允正和他是在北京相识相爱，于1954年国庆节在一间小房里结婚的。上世纪60年代一起来临沂，头三年他们生活还是幸福美满的。之先在报社当美编，允正在医院做针灸、按摩。因为允正能歌善舞会演戏，在演出《江姐》和《霓虹灯下的哨兵》时，还担任女主



自画像（大学时期）



皮之先创作中

角。但1965年一次意外打击，给他们的家庭笼罩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这年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给农民治病，允正主动报名，到罗庄的农村去行医。当任务完成要回城时，生产队煮猪头肉招待他们。允正吃了长满寄生虫的肉，致使头脑里也长满寄生虫。发作时人便失去知觉，突然倒地。因此，允正经常被摔得头青脸肿，四肢骨折也时常发生。因为是少见的怪病，当地医生误诊为“癫痫病”，以致拖了数年也未治愈。直到以后去北京宣武区医院神经科，专家才确诊为寄生虫。虽经中医用中药杀死了成虫，但大脑布满了病灶，还不时地发病。

夫人的病给之先带来多大的打击，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压力。他一边要忙着画画，一边要照顾妻子，实在忙不过来，于是长年雇保姆帮忙。这样才使之先能脱开身去外地写生。

由于之先艺术天赋很高，又得名师教导，加以个人的勤奋努力，他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就画种说，他不仅会国画，还会油画、年画、连环画、漫画等。国画已如前述，不再重复。就油画而言，我们看到的有在中央美院学习时画的《自画像》《俄罗斯妇女像》，来临沂后画的《中学生》《沂蒙山家春满园》。这些作品明显是师法罗工柳和吴作人，追求画出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如《中学生》这幅肖像画，画面简洁明快，色彩单纯中带丰富，特别是有意减弱明暗反差和色彩冷暖对比，以及背景留白，都近似国画。此画充分发挥了笔触的表现力，准确地刻画出沂蒙女孩敦厚、淳朴的气质和风采。《沂蒙山家春满园》这幅风景画富有沂蒙山区地方特色和感人的田园气息。作者忠实于大自然的原景进行创作，特别强调空间的深度感和真实感，虽然画面不大，却把农家小院、草房及远山很有层次地表现出来了。它不同于印象派平面色彩构成，而在画面内采用透视原理。我们见到的之先的年画有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兰花》四条屏、与车天德合作的《江山春晓图》（中堂，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泉城风光》（四条屏，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陈兰花》是遵照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的，描绘和歌颂的是农村先进妇女的形象。《江山春晓图》和《泉城风光》则是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艺术上看，其人物画以单线勾勒和色彩平涂的技法为主，其构图丰满，色彩艳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其山水画类似国画的工笔重彩，又吸收了民间年画的构图和色彩处理，也易为老百姓所接受。二幅山水画在全省年画评奖中分别获二等、三等奖，又

大量印刷（60万份），因此在省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之先创作的连环画数量比较多，他个人创作和与别人合作的共有13本。如《小二黑结婚》《侯哥弹和他的少年队》《铜墙铁壁》《沙家店战斗》《上海工人运动史画》《一个出色的女电工》《列宁的故事》《巧姑娘》《厉家寨》《雏燕展翅》《毛主席讲的一个故事——鲁班石》《公社就是金饭碗》《田现堂爱社如家》等。

连环画是用多幅画连续叙述一个故事或事件发展过程的绘画形式。它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上海。民国时期发展很快，有大量的创作出版发行，也涌现出一批连环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需要用文艺形式来宣传先进的思想，连环画作为一种普及读物，理所当然地为政治宣传所青睐，成了为政治服务的有力武器。毛主席指示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连环画，把那些宣传神怪、武侠、迷信的旧连环画去掉。”1950年，之先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文化部蔡若虹的领导下，与几位同学一起参加改造旧连环画，创作出新连环画《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的。

几十年来，之先坚持连环画创作，题材大约有三类：一是表现抗日战争和其他革命斗争的。如：《铜墙铁壁》《侯哥弹》。二是配合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如《小二黑结婚》就是配合婚姻法的宣传的。三是反映农村的新人新事，歌颂农民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精神。如《雏燕展翅》《厉家寨》等。从艺术上看，之先的连环画是不断提高和日臻完美的。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他注重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塑造出许多有血有肉的鲜明形象。对人物的动作、服装甚至发式都进行了个性化的描绘。从构图上看比较多样化，章法上处理得疏密相间，层次分明。有时用中国画中高远的章法，从平易中求变化，避免了画面支离破碎的缺陷。背景的描绘也达到丰富化，注意典型环境的描画和气氛的烘托，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也反映出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表现能力。



皮之先创作的连环画《厉家寨》

沭河的历史趣闻

mBF9



沭河的“沭”字，读音bèng。

此字非本地人一般不知其发音，说起沭河来还有一则流传的历史趣闻。

据《费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圣驾南巡，正月二十七日自泉林驻蹕荆埠营。”乾隆皇帝这是第二次巡游江南，路过固子万松山行宫，住宿歇息。

这天早晨，乾隆皇帝和皇太后、皇后及随从人员，骑马坐轿，出了荆埠行宫，浩浩荡荡由西往东，迤迳而行，过了颍舆古城，来到蒙山皇道，回首了望，蒙山顶上积雪皑皑，松柏叠翠，在阳光的照耀下，相映成辉，不禁想起，皇祖康熙皇帝曾三次南巡路经此地，留有《蒙阴晓雪》名诗，便即兴依祖韵，咏蒙山诗三首，其一曰：

辛未巡江南，路经东蒙东。
兹因驻泉林，取道鲁附庸。
乃在蒙羽阳，颍舆考古封。
回首望云岩，崔巍扶郁葱。

乾隆一行人马沿着皇路上坡下崖，越沟过河，一路走走歇歇，日近中午，来到费县沭河之上，这里建有一座皇桥，过了皇桥，来到一处兵营防地。虽是寒冬季节，随从人员个个累得张口气喘，满头大汗，皇帝传旨歇息，有的喝茶，有的整衣冠，有的磕除鞋中的泥土。太后、皇后也在轿中坐闷了，被宫女扶出观看四面景色。

此时，太后看到河面上热气直冒，鹅鸭戏嬉，河中鲤鱼翻腾跳跃，问道：“皇儿，天气如此寒冷，这河为什么不结冰还冒热气呢？”

乾隆略一沉思，说：“母后，此河因有温泉水汇入故不结冰。”

太后点了点头，又问：“皇儿，这河叫什么名字？”

乾隆皇帝知识渊博，临出游之前，在宫中早已把沿途各地的名胜古迹通览一遍，特别对费县的历史更加留意，什么古费城出土过犢，孔子堕三都等等，因此他知道这条河发源于平邑大匡崮（也称太皇崮），还有个古怪而难听的名字叫沭（崩）河。此刻，乾隆不敢说这河叫沭河，可又不能说不知道，怕扫了太后的雅兴。

乾隆皇帝忽然看到不离左右的宠臣和珅，急中生智，便说：“和爱卿，你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吗？”和珅一听，立刻两腿发软，头上冒汗，便跪倒在地，连声说：“恕小臣无知，这条河太小了，臣不大在意，故不知它叫什么名字。还是问问沂州知府李希贤吧！他在此当了5年知府了。”和珅是个机灵鬼，他跟随皇帝出来游玩，就住在沭河皇桥东边的公馆里，怎么会不知这条河的名字呢！只是怕犯忌，不敢说罢了。乾隆皇帝一脸的不高兴，只得传唤沂州知府李希贤，问道：“李爱卿，你知道这条河叫什么河吗？”

李希贤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对这条河太熟悉了，他刚当知府不久，就闹水灾，他还带领百姓治理过这条河呢，说真话吧，怕招杀头之祸，因古时候皇帝死了称“驾崩”。

他听说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皇帝听说德州有个“桑园镇”的“桑”与“丧”同音，下谕改为“柘园镇”，要说费县这条河叫“沭河”那不是说皇帝一家到了绝地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说个白字吧，又怕皇帝说你无知，不胜任当知府的官。

李知府犹豫片刻，便跪倒在地，连连叩头，说：“皇上，臣该死！恕小臣粗心，这条河在费县境内，绕临沂城北流入沂河，我平日很少出城，故不知这河叫什么名字，还是问问费县杨知县吧。”乾隆皇帝虽然心中不悦但也欣赏他的乖巧，只得顺水推舟，连声传唤费县知县。

时任费县知县，名叫杨焯，是河北省固安人，进士出身，是个饱学之士，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听皇帝唤他，一溜小跑，来到跟前，双膝跪倒，口称万岁。

乾隆皇帝问：“杨爱卿，起身吧，你知这条河叫什么河吗？”

杨知县一听，吓得脸都变了颜色，心想：李知府这个老滑头，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我推给谁呢？又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蒙混一时再做打算。说：“知道。”

“叫什么名字？”

“左边一个示字，右加一个方字。”

“读什么呢？”

“当地人读‘方’，四四方方的‘方’，叫方河。”

乾隆皇帝听了，楞了一楞，又继续问：“这条河为什么叫方河？”



杨知县抬起头来，看到皇帝脸上露出喜色，便放开胆，大声说：“禀皇上，这条河发源于平邑大匡崮，从西往东流经梁邱、许家崖，再经费城东南转而东北与浚河汇流，顺流而下，绕沂州府北侧注入沂河，因流经费县古‘防城’而得名。”

此时，乾隆皇帝听了点了点头，费县历史上确实有防城和沭城两个地名，只是位置不同，乾隆皇帝非常赞赏杨焯的聪明机智，沉着老练，也不点破，随将错就错地对太后说：“禀母后，此河叫方河，四四方方的‘方’。”并将该河的发源、流经地方和名称的来历说了一遍，太后听了很高兴，传旨继续行进。这样，一场虚惊才被掩饰过去。

大队人马来到万松山行宫歇息，乾隆皇帝看到万松山行宫如一颗明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河中央，宫中苍松翠柏，画廊回幽，观山楼高耸入云，又想到刚才君臣的趣对，不禁诗兴大发，命随从取来文房四宝，以“方”韵写《渡沭河》诗一首：

郑宛归鲁泰山沭，因以名河出大匡。

清浚合流波益浩，万松如在水中央。

从此，费县沭河因乾隆皇帝这首诗而出名，至今它的名字在民间仍有“方河”的读法流传。

兖州城敌特组织被“钓”记

谷守春

1948年华东野战军向盘踞在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大反攻，收复了大片地区。7月13日，一举解放了津浦铁路线上的军事重镇兖州城，切断了敌人由北向南的通道。盘踞在济南、徐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以济南、徐州为据点，在徐海一带集结大批军队，企图作垂死挣扎，卷土重来。潜伏在兖州的国民党第十绥靖区二处兖州行动组组长路同一，也遥相呼应，蠢蠢欲动。他们网罗邹县、曲阜、济北等地匪首，组织匪特武装，刺探我军事情报，妄图里应外合，推翻我新生的革命政权。

不安分的理发匠

1948年7月兖州解放后，兖州县公安局成立，李丰平任局长，朱礼泉任副局长。兖州县公安局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了肃清战犯、特务、土匪，建立革命秩序，保卫人民安全等工作。8月初的一天，第三派出所调查社会动态和匪特组织过程中，发现岗子街理发匠吕公甫处经常有身份不明、行动可疑的人来往。这件事引起我公安人员的警惕，随后对吕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了调查。证实吕是个唯利是图的情报贩子，曾被我利用过，现又被特务收买利用。第三



兖州人民欢迎
解放军入城

派出所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

李丰平局长非常重视，指示县公安局侦察科和第三派出所协同作战，进一步侦察调查，力争尽快破案。很快证实，吕公甫确已被特务分子路同一利用。路曾干过国民党的营长，现在兖州是无业游民，是个阴险狡猾的家伙。他和一些特务分子经常来往，行迹可疑，有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可能性。恰在这时，驻济南国民党军长吴化文的警卫连长刘保和来兖州刺探我军情况，被抓获。刘的年龄、长象、口音和我侦察员徐义海基本相同，为了全面弄清兖州敌特组织的内幕，及时打击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兖州县公安局决定，派徐义海以刘保和的身份打入敌内，开展侦察工作。李丰平局长亲自找徐义海谈话，交待说：“潜伏的敌特对我危害很大，上有徐州、济南方面敌特机关指挥，下有残余的特务、兵痞土匪为基础，如不及时破获，对维护革命新秩序，发动群众支援大军南下都极为不利。事关重大，组织上决定派你打入敌人内部，另派位察员陈永泉、晁文正以卖烟酒、烧饼、油条为掩护，在外线配合行动。徐义海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吴化文的警卫员

一连几天，徐义海多次提审刘保和，审清了刘来兖州的目的、任务和有关特务组织的情况。又多方面了解、琢磨刘的情况，掌握刘的性格、特点、嗜好。同时，我们又对吕公甫进行了教育，指出国民党失败无疑，人民解放战争必将取得重大胜利，打掉其幻想，争取其向人民政府靠拢，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吕取得了成效，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立功赎罪。

8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兖州集市上热闹非凡。吕公甫领着徐义海来到东门外的一家饭馆，挑了张僻静的桌子坐下，要了盘烧牛肉，一盘油炸花生米，两壶酒，推杯换盏起来，等候与匪首接头。11点刚过，饭馆里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30多岁，西装革履，衣着讲究，面象阴险。女的紧跟身后，20多岁，一身阔太太打扮。两人一到，吕公甫忙起身迎上前去，热情地叫了声“路大哥”，见来人瞪了他一眼，忙压低嗓子指着徐义海介绍说：“这位就是我说过的刘先生，是吴司令的红人，警卫军座多年，也是有功之臣。”接着又对徐介绍说：“这位是路先生。”徐义海很自然地和路相互握手。客气一番后，四人同桌共餐。吃饭中，路同一有意盘问：“刘先生是哪里人？来兖州有何贵干？”徐答：“我是临朐人，这次来兖州是给吴司令取点东西，顺便打听一下共军对济南的战略部署，何时攻打济南。”并巧妙地问路：“路先生是……”路说：“我是十绥区二处兖州行动组的组长，这年头还得靠兄弟你帮忙混碗饭吃。”徐义海顺水推舟地说：“路先生不必客气，我初来乍到，还凭您各方照顾。”饭后，路把徐安排在饭馆住宿。

经过几天的交往，路对徐有了好感，并流露出请徐在吴司令面前美言的“希望”，徐义海当然是义不容辞，连称“一定一定”。这样路同一对徐义海就更亲近了，甚至有些特务活动计划，也请徐义海帮助指教。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长，从事特务活动多年，敌人逃跑时接受了潜伏任务留在了兖州。观在他已网罗起王德元、李怀宝、史庆春、颜士海、张景启等五股散匪武装，活动在县城东门外、天主教堂、屯冠庄铺等地，多次在城内外打信号弹、抢劫财物，编造谣言，制造混乱。

大鱼是徐州田豁子

徐义海及时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领导分析路同一的背后可

能还有人操纵。因此，指示徐义海继续深入开展内线侦察，进一步弄清其内幕和罪行，以便一网打尽。一天下午，徐义海购置了酒菜，请路同一和几个匪特主要成员。这帮匪徒都是利欲熏心见钱眼红的家伙，一见徐如此大方慷慨，便认为徐义海财大气粗，够朋友，于是以各种方式向徐义海讨好献殷勤。路同一拿出一支手枪，对徐说：“刘先生，我们在八路军地盘活动，要提防些，保护自己的安全，让这支手枪给你防身用吧。”徐义海接过后，迎合道：“多谢老兄关照，我在这里一切依靠路先生和诸位了。”在匪首胡吹海榜的牛皮中，徐义海留心记下了需要的情况。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路同一匆匆来到徐义海的住处，对徐义海和吕公甫说：“今天，总部要派一位田先生来，让我们在这里接他，你们二人也和田先生认识认识。”深夜12时，一列由徐州方面开来的火车进站，一个身材矮小，30多岁的豁嘴中年男人下车后走进花园凉亭。此人见到路同一忙招呼：“路大哥。”路同一连忙迎上去握手，并向徐、吕介绍说：“这位就是田先生。”接着又对田说：“这位是刘先生，这位是理发店的吕公甫，今天认识一下。”说完，对徐、吕二人说：“我和田先生还有别的事，你们两个回去睡觉吧。”支开了徐义海和吕公甫。

徐义海认为田的到来是一个新的重要情况，便连夜到县公安局，直接向李丰平局长作了汇报。李局长听取汇报后，对下一步侦察工作又作了具体交待，并拿出十块大洋，让徐给这位新到要员接风。

麻将桌前化险为夷

为了尽快接触徐州来人，弄清姓田的来兖州的目的，徐义海通过路同一，在路的住处宴请了姓田的。在喝酒闲谈中，田流露出，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来的，主要目的是以军统特务路同一组织的武装匪特为基础，起用国民党军溃逃时埋藏在兖州的电台、枪支，建立特务据点，组织反革命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控制津浦线。并得知只有田才知道埋藏电台、枪支的地点。这些重要情报及时转到了县公安局，李局长指示：加强外线侦察，严密监视田豁子的行动。正当侦察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田豁子、路同一和路的小老婆在路家里吃晚饭。饭后，路的小老婆认为吴司令的红人有钱，突然拉徐义海打麻将。徐未加思索就顺口说了声：“我不会，你们玩吧。”话音刚落，一旁的田、路二人脸色全变了，眼睛盯着徐义海，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徐义海意识到出言有失，马上来了个后发制人，表现正常，转而谈了如何扩充人员、组织武装抢劫的事。

事后，徐义海如实向李局长和侦察科长汇报了这一情况，领导们嗔怪说：“你太粗心了，吴化文的警卫连长哪能不会打麻将呢？”徐义海原先知道一些打麻将的知识，于是李局长又安排他抓紧学了一天。然后，在路的住处又主动提出与田、路及其小老婆打麻将，玩了几回麻将后，敌人的怀疑才消除了。

8月底的一天，路同一把徐义海叫到他的住处，田豁子早已在那里等候。路讲：“刘先生，现在田先生来了，咱们不能光这样，得做点生意，干出点名堂来。我和田先生商量，准备在旧关截兖州去济宁的运输汽车，另外组织几个人从中御桥贸易货栈弄些票子来。”徐义海听后，心里一愣，他想：敌人要下手行动了，如果阴谋得逞，我们的同志要流血牺牲，国家财产就要受重大损失，必须拖住敌人。他若有所思，附和着说：“路先生说的对，咱们是得行动了，只是我认为在旧关截汽车，对咱们不利，一旦截不成都不好脱身，不如选在孙氏店附近，另外，在中御桥行



动，也应把情况侦察准再搞。”对徐义海的这番“好意”，田路二人表示赞成。田说：“刘先生说的对，不愧是吴司令手下的人，这次行事你要多出主意。”路说：“我们行动后，就把埋藏的电台和枪支挖出来，给总部取得联系。把弟兄们武装起来，也到时候了。”三人商量后，分头行动。

适时收网战果丰硕

第二天，路同一便带着小老婆，坐上黄包车，到兖州公路上查看运输车辆来往时间。田豁子到中御桥观察地形，寻找埋藏电台、枪支的地点，并集中匪特，为抢劫作准备。徐义海迅速将情报报告了县公安局。接到徐义海



徐义海与夫人

的报告后，李局长立即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一致认为敌人的组织情况及行动计划已基本上搞清楚，而且敌人马上就要下手破坏，这个案件没有再继续侦察的必要，应及时收网。这个意见得到了兖州县委、鲁中南区党委的批准。

晚上9时许，徐义海秘密赶到了县公安局。李丰平局长、朱礼泉副局长和侦察科长等领导同志早已在办公室等候。李局长起身迎上来，握着徐义海的手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谢谢你，徐义海同志！”接着，其他领导同志也围上来，互致问候。话转到主题上，朱副局长传达上级指示说：“破获这个案件的时机成熟了，上级批准我们今晚行动，将匪特一网打尽。”

当晚，市公安局组织武装部队和局机关部分干部共50多人，划分为三个行动小组，分头行动。徐义海带领第二小组的十几个同志在城内东门外执行逮捕任务。当夜在邓家窑、文庙街将匪特王德元、李怀宝抓获。在岗子街路同一的住处，徐义海叫开了门，将路抓获在床上。与此同时，其他两众小组也按原定方案行动，天不亮各行动组把逮捕的人犯押到了县公安局，但特务头子田豁子漏网了。

徐义海马上带着侦察员投入了抓捕田豁子的战斗。下午4时，发现田在中御桥靠在桥栏杆上，倒背着手在东张西望。徐义海和侦察人员迅速围了上去，把田逮捕归案。

至此，这个潜伏的武装匪特组织被彻底摧毁了。12名主要罪犯全部落网，缴获短枪5支，步枪9支，汤姆式冲锋枪1支，子弹226发。从中御桥一个国民党军官太太的家里，起出了敌人隐藏的手摇式电台3部，长短枪42支，重机枪1挺，小炮一门。

季氏与费县 (中)

丁兆铭

季孙意如 (平子)

季孙意如，谥“平”，生年不详，卒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为季友六世孙，季文子四世孙，季武子之孙。季武子无嫡子，立庶子悼子（纥），悼子早卒无封。季平子继祖父季武子为鲁国正卿。辅佐鲁昭公、定公。在昭公时代，曾一度逼走昭公，代昭公摄政近10年。

季平子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晚期，鲁国已积贫积弱，三桓四分公室后，鲁室愈加衰微。季氏专权，更为肆无忌惮，甚至僭越无礼。

季平子一生应该是功过参半，对其否定太过，也不客观。季平子还是一个很有作为、非常勤政、很有魄力的政治家。在他的辅佐下，鲁国尚能较为平稳地发展，加上外交上的巧妙周旋，鲁国还能勉强保住具有“千乘之车”，有一定实力的中等诸侯国家，这已实属难能。

季平子在内政方面，善于营造和治乱。他任正卿伊始的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冬，筑郎囿（注：有说在今费县东南）”，而且“季平子欲其速成”亲自督工，可见他勤政之一斑。此时的鲁国社会政治已危机四伏，人心思乱，即使季平子的私邑费地，也是连发叛乱。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受三命为卿”（注：地位超过其祖上），而“不礼于南蒯（注：季氏家臣，主政费邑）”。南蒯即鼓动子仲，欲赶走季平子，让子仲代为国卿，把费地归还鲁公。于是季平子出兵平乱，南蒯出亡齐国。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春，叔弓帅师围费。”这次是季平子派叔弓包围了费邑。但“弗克，败焉”。季平子接受鲁大夫冶区夫的建议，离间了南蒯和其属下的关系，于是“费人叛南氏”，季氏取得了胜利。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逐劫南蒯……请送子”。司徒老祁驱逐了南蒯，南氏奔齐。又被齐派鲍文子送交还老祁。南蒯据费起事，旗号是“抑私权，张（大）公室”，却被季氏以“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的罪名镇压。平定南蒯之乱，虽属季平子保卫私邑、巩固后方之举，但客观上对稳定鲁国大局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季平子在鲁国专权，其地位之所以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是因为他甚得民气。他善于聚拢民意利用民心。例如昭公十三年，派叔弓率师围费，失败。平子恼羞成怒要屠杀费人，但很快就接受冶区夫的建议，见到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解其乏困”，结果“费来如归……费人叛南氏”，“南氏亡”。再者，昭公被平子驱逐出鲁，流亡齐、晋之后，平子代昭公摄鲁政近十年，其间，鲁国反而

更加安定，如果没有民心基础，平子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民不听从的，何谈稳定鲁国？当然这与昭公长期失政而不得人心也有极大的关系。季氏有民望，晋国史墨这样评价：“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鲁国人知有季氏，不知有鲁君。鲁君丧失民心殆尽，季氏勤政而得人望。人心向背，决定成败，此足可以资执政者为鉴。

至于季平子外交方面的功绩，他依然秉承他祖上的策略，像他的先辈一样，作为主角活动在外交舞台上。送往迎来，即便曾被晋国强行劫持以为人质，受过委屈，但他依然恪尽职守，维护着鲁国的利益，驾驭着鲁国之舟在艰难中前行。

季平子之失，历来为史家否定平子之口实，但唯物史观应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评价。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平子伐莒，取郟”，得胜后回鲁，“献俘，始用人于亳社”（注：用活人祭祀）。好像他是使用活人祭祀的始作俑者，其实，这在当时的奴隶社会为普遍行为，只是太过分了。因此连臧武仲在齐国都指责其无义。献俘亳社事件表现了季平子残忍冷酷的本性。

自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受三命为卿”，权力超过了他的前三代正卿先人，权力更加膨胀，专制更为肆无忌惮。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富超公室（《论语》评价季氏“富过周室”），在三桓中又一家独大，腐败也特别突出。

关于逐君事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季氏与邾昭伯斗鸡取乐，两家为炫富，“季氏介其鸡，邾氏为之金距”，季氏为自己的鸡全身披甲，邾氏为自己的鸡爪加上金质外装，结果两家为此结怨。就因为这次斗鸡事件，发生了季平子逐君事件。昭公本就怨恨季氏的专横跋扈，又因季平子的庶叔季公亥因家事怨恨季平子，于是在昭公面前谰言季平子，并联络邾氏以及孟叔两家，和昭公一起发兵进攻季平子。在季平子请求昭公允许他“待于沂上以察罪（注：在曲阜城南沂河边上等待调查）”、或“自囚于费”（自贬辞官归隐私邑）、或“以五乘亡”（允以五辆车马出走诸侯，流亡避难）都不答应的情况下，又加上在关键时刻孟孙、叔孙倒戈站在了平子一边，结果三桓联合打败昭公，致使昭公先后到齐晋流亡避难，一去即是八年，最后死在晋之乾侯，终未复位。驱逐国君是大逆不道，但从季平子的请罪看，实在看不出平子有主动篡位的野心异志，史料中也未见到鲁国民众对昭公的支持和对季氏的谴责。至于对此事件的评论，诸侯国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晋国史墨的评价外，范献子对此事件的看法反而归咎于鲁君的失政，表达了对季氏的同情。就连在昭公流亡期间始终追随昭公左右的大夫子家子都认为季氏得民心，请求昭公不可与季氏对抗。只有孔子就此事提出国君应“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见解，认为国君不可假以臣下大权，不可让臣子做大，大臣的权限一定要在国君的可控之下。此言确实为警世之论。再从后来昭公三十二年，季平子曾亲去乾侯向昭公献马以及请求昭公还国复位来看，说季氏为鲁国的逆子贰臣，实在也太冤枉他。此事只好让后世史学家作或仁或智的解读吧。

季平子真正的僭礼行为，应该是在埋葬鲁昭公的问题上。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春秋》载：“十二月乙未，公薨于乾侯”，次年，即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七月癸巳，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季平子认为，昭公逃国离位是失职，不配葬于祖林，于是把昭公降格与先君坟墓隔开，葬到祖林以外去。荣驾鹅当即指责季氏“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左传·定公元年》），尖锐地指出，季氏感情用事的做法是影响恶劣的非礼行为。孔子更是以实际行动反对季平子的非礼，“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左传·定公元年》），孔子坚决纠正了平子

的做法，左昭公墓前挖了一条沟，扩大了墓地范围，使昭公墓进入了鲁国公墓之内（孔子当年44岁，任鲁国司寇）。季氏此举当时就遭到抵制，后世多所非议，人事自有公论。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季平子在私邑费“行东野，未至，丙申卒于房”（《左传·定公五年》）（注：房即今费县方城），这个多所作为又颇具争议的人物，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寿终正寝。葬地不详。

季斯（桓子）

季孙斯，谥“桓”，季平子之子，生年不详，卒于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为鲁国正卿，辅佐鲁定公、哀公两君，执政13年，英年早逝。

昭公以降，至鲁定公、哀公两世，周天子已江河日下。鲁国公室更加卑弱，此时社会乱象丛生，矛盾重重。诸侯叛周，大夫欺君，家臣背主，大夫之间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人民反抗此消彼起，国内各层面矛盾日趋突显，危机开始暴发。尤其是维护统治者的精神支柱“礼”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鲁国多事之危局和历史之使命把季桓子推向了这段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因此，桓子执政，时间虽短，但其业绩却轰轰烈烈。

季桓子平定阳虎之乱，前后用去五年时间，花费了他执政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还强。阳虎本是季氏家臣，长期主费。定公五年，季平子故世，阳虎向主持殡葬平子事宜的仲梁怀索要平子生前佩戴、象征权力地位的玕璠（玉器），仲梁怀不与，由此结怨。这种行为，已经暴露出阳虎觊觎最高权位的政治野心和非礼行为。本年，季桓子完成父亲葬事后“行东野及费”（《左传·定公五年》），时为费宰的子泄出城慰劳桓子，桓子表示谢意，子泄慰劳仲梁怀，仲却不谢。于是子泄大怒，唆使阳虎发兵囚禁了桓子、公父文伯，逐仲梁怀，杀公何藐。“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乙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五年》）。这次政治变故，阳虎用劫盟（劫持胁迫）手段制造了政变。如果说当年季平子驱逐昭公是臣子对国君的大逆不道的话，那么这次阳虎囚禁桓子应该是家奴对主子的造反。上行下效，等级名分不可触动的“礼”被撼动了。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阳虎代三桓执掌鲁国政权，但阳虎深感三桓对自己的威胁，“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将享季氏于浦圃而杀之”（《左传·定公七年》）。想用阴谋除掉三桓，代替三桓的人事都已安排好了，结果阴谋败露，反被三桓联合打败，只好逃走。“入于灌，阳虎以叛”（《左传·定公七年》）。（此后平定阳虎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定公九年，即公元前501年）。鲁公和三桓发兵讨伐阳虎，阳虎欲借齐兵抵抗，齐国权衡利弊，结果抓住阳虎送给鲁国。后来阳虎又逃脱，去晋，做了赵氏家臣。平定阳虎之乱，季氏多为自己利益，但客观上还是维护了鲁国的权威和稳定。所以后人不予否定。

“堕三都”（三都：季孙氏之郟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之郕邑，在今山东东平县南；孟孙氏之邾邑，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事件是一场鲁国内部进行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目标，针对鲁国最大利益垄断集团“三桓”进行的政治斗争。

这时的“三桓”在鲁国的势力已是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他们的私邑早已僭越了礼的规定，严重超标（主要是城墙的高度、厚度），这早已让鲁国朝野忧心忡忡。这时孔子55岁，在鲁国参政，为大司寇之职。《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孔子此次动议，正中定公下怀。《春秋·定公十二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整个过程《左传·定公十二年》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郕，季氏将堕郟，公孙不



孔子圣迹图·礼堕三都

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围之，败之于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郈，公敛处父谓孟孙，堕郈，齐人必至于北门，且郈，孟氏之保障也，无郈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郈，弗克。”这段记述，细节毕现，生动真实，堕三都并不顺利，叔孙氏自己主动拆掉违规超标的城墙。可堕费却使用了武力，主要是费邑的行政长官公孙不狃、叔孙辄公开抵抗。这场战斗决定改革成败，所以定公亲临战场，孔子指挥，季孙氏主动支持堕费。而孟孙氏却以郈为鲁国北郊防齐之要塞为借口，拒绝拆除。鲁公也同样以兵包围，欲以武力解决，但可惜的是不克而返。堕三都并未取得彻底成功。关于季桓子为何支持并亲自参与堕费，武力拆除自己私邑城墙，似乎非常令人不解。对此，孔颖达疏之解释颇合情理。“由费城险固，家臣数以背叛，仲由为季氏宰，进计季孙，防其后患，令堕三都，是以故毁坏其城”。“患其拒之，故帅师而往”（《十三经注疏·春秋左氏传正义》）。孔疏似乎认为季氏完全是为了自己私邑的长治久安。但这次事件，至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季桓子忠于公室以及牺牲自家利益的胸怀气度，也算难能可贵。

但是季氏的腐败越礼逼走了孔子。孔子的“夹谷之会”外交活动（定公十年）以“礼”舌战齐国君臣，不战而收复了被齐掠去的郚、讙、龟阴之田。加之定公十二年的堕三都功劳，深得定公信任，所以定公十四年，以孔子大司寇身份摄行相（外交礼仪官）事。但很快孔子失望了，《论语·微子篇》：“齐人归女乐，季桓子爱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堕三都不彻底，孔子已经遗憾。季桓子和鲁君接受齐国美女这种害礼伤俗的腐败行为，更使他愤慨，看不到希望，于是选择了挂冠逃职，出游避祸之路。“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周游列国的讲学生涯。孔子的出走，季桓子不无责任。

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孙斯帅师城启阳。”（《春秋·哀公三年》）也许是积劳成疾，这一年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临终遗嘱两条，一是安排其继承人：“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勿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肥为桓子庶子，后承袭桓子为卿）第二条遗嘱是让康子召回出游列国的孔子，加以重用。《史记·孔子世家》：“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这年孔子61岁，在陈国。这也算是季桓子对亏待孔子的忏悔与补救。

吧。

季肥（康子）

季肥，谥“康”，季桓子之庶子，生年不详，卒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八年）。桓子卒，为鲁正卿，执政24年，为季氏家族第六代鲁国正卿。

季康子执政时的哀公时代，鲁国颓势已不可逆转。鲁国甚至已成晋、齐、吴、越、楚几个大国的砧板之弱肉，随时任人宰割。季康子就在这种岌岌危局中勉力支撑着随时将倾的鲁国大厦。

在乱局中，康子在外交上还是极力维护着鲁国的尊严。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新崛起的南方强国吴国和鲁公会于鄫地时，吴向鲁索要“百牢”之礼，这本是非分要求，鲁不得已满足了吴国，已经有失国格。可吴国太宰嚭要召见季康子，更是鄙视鲁国的无礼之要求。“季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的无礼行为是违背外交礼仪的，季康子义正辞严拒绝，只派子贡前去应付了一番。有时，季康子为了鲁国的根本利益，也会委曲求全。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1年，战国五年），“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太宰嚭而纳贿焉，乃止。”在吴越之间搞平衡，竟使用贿赂手段平息事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八年），越国以伯主身份，“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阳”。越国提出土地要求，并强行定盟，康子“病之……曰：子贡若在此，吾不及此夫”。面对屈辱，耻于妥协于越国，又无可奈何，只发怀念外交能人子贡。

季康子在鲁国安全面临挑战、遭到外来侵略时，也是坚决抵抗的。由于齐国连年侵略，鲁哀公十一年，齐鲍牧掠走瀛与闾地。哀公十一年齐再次伐鲁，“春，齐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有曰……若之何？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注：鲁国都之南门）之外……师及齐师，战于郊”。“宵，谍曰，齐人遁”。战斗短兵相接，非常惨烈，但最终打败了齐人，这就是著名的艾陵之战。胜利后，康子深谋远虑，意识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因此，“季孙命修守备”，以备齐人。

鲁国公室的财政到康子时代已成严重问题，经济十分拮据，甚至面临崩溃。为了增加收入，这时就有了季康子的“用田赋”的田赋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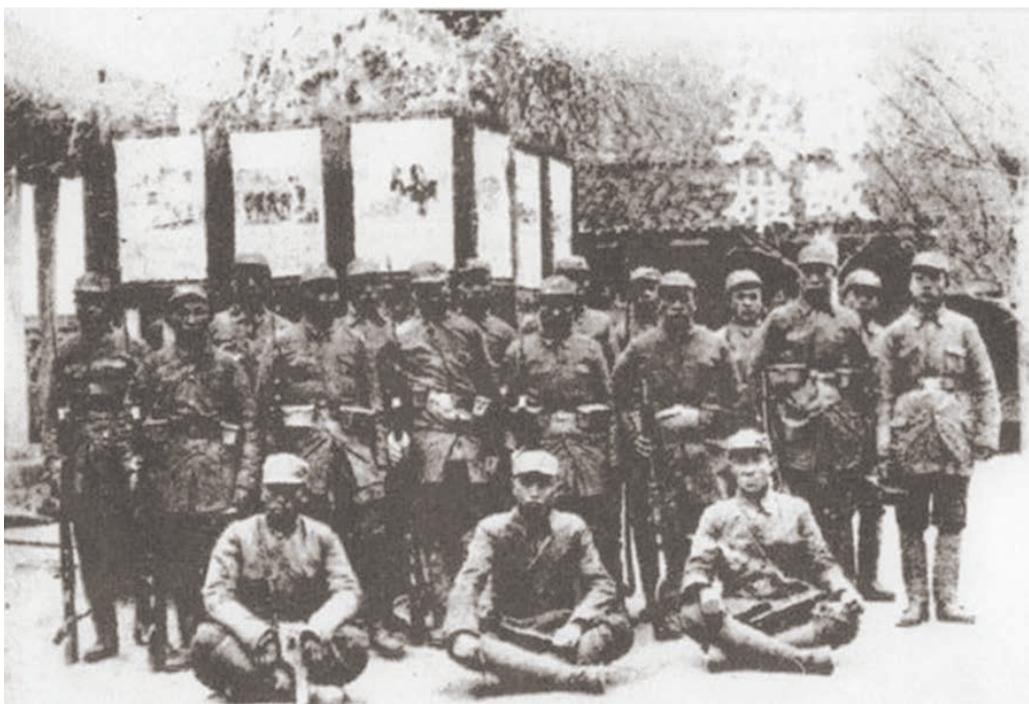
改革田赋，就是将军费改按田亩征收，实质就是于军费之外再加征田赋，这就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康子要改革，同孔子商量，“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孔子最初是三问而不答，后来私下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孔子认为，给与人民的要优厚，取之于民的要减少，做事要适中，贪得无厌，永无满足。如果要用田赋，早有法典规定，又何必问我呢？表示了不支持的态度。关于法典规定的田赋标准，杜预解释为：“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注：丘、井皆田亩数量单位）。而季康子的新“田赋”是“一马三牛之外，又计田之所收，复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杜预注《春秋·左氏传》）按此解释，新田赋就是比原来的税赋翻番加倍。如此，民何以堪！但季康子一意孤行，于哀公十二年推行开去，“春，用田赋。”（《春秋·哀公十二年》）

关于季康子与孔子的关系。首先，遵桓子遗嘱，康子花重金从陈国请回了孔子，但也许忌于孔子的直言敢谏，刚正不阿，或对自己不利，并未加重用。康子有幸的是，他和孔子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多，受其影响也最大。《论语》中直接说

飞上郯城城头的张桂林

高雷

张桂林，山东省招远县人，1921年出生。他出身贫寒，家中只有半亩山地，十几岁时就帮人打工，第一年分了12元钱，第二、三年挣了二三十元。1939年夏他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了滨海区，在抗大一分校受训，后来编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1944年8月已经是四班班长的他，在山东军区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代表大会上被评选为一等战斗英雄。张桂林在班里很模范，无论什么事都领头干，自己反而谦虚地说：“我们班里的事不大用支配，大家都争着干”。他的主要功绩是在攻克郯城的战斗中，第一个登上了城头，控制和扩大了突破口，保证了后续部队地突



一一五师教二旅攻克郯城的英雄

入并向纵深发展，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教二旅旅长曾国华在《郟城大捷》中回忆说：

第五个战士接近城垛。他没有立刻爬城，却把身子向下一缩，向城上飞快扔出几颗手榴弹，浓烟飞腾，再一看，他已经窜上了城，灵活的身体一闪，向左右敌人接连扔出几颗手榴弹。晨曦中，他那矮小结实的身影显得更加清楚了。

这战士灵巧勇敢的动作使我惊喜，不由的喊叫起来：“看！看！飞上去了！那是哪个？好快呀！”

以后，战斗下来我才找到那个战士。他叫张桂林，矮胖结实，红脸庞，大眼睛，十分机灵。是他头一个蹬上城墙，并巩固了阵地，党委给他记了功。由于他蹬城动作灵活勇猛，仿佛是飞进去的，所以人们叫他“飞将军”。一时，“飞将军张桂林”的名字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郟城南邻陇海铁路，北靠沂蒙山区，是进入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也是敌人在鲁南的主要兵站基地。1943年1月19日晚，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在代师长陈光率领下，长途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包围了鲁南重镇郟城，因内线配合发生意外，智取变更为强攻。战斗打响，一一五师教二旅六八六团八连在郟城南门担任主攻。

“见鬼！里面还有一道门！”当八连炸开郟城南门之后，六八六团团团长贺东生大喊。日军不仅在郟城南门设计了双层城门，而且里面堵满了沙包。攻城受挫，马头镇的日军援兵接近城垣。打还是不打？指挥员的决心一度动摇，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好在战斗打响之前，滨海军民已经破袭了临沂到郟城的公路，各县大队区小队也在郟城周围与增援的敌人交缠在了一起。这为战斗赢得了时间。

19日20时，六八六团再度在郟城南关发动进攻。这次，贺东生把团指挥所移到了距离护城河只有40多米的地方。

八连仍然是主攻连，一排架桥，三排架梯子，二排负责登城突击。张桂林他们埋伏在外壕边沿废墟中，八连副连长陈朝山动员大家：“同志们，摆在面前的是郟城，打开郟城，要我们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胜利就是我们的！”

23时，攻击开始。八连一排长令二、三班掩护，一班架桥。一班一部分人扶住桥板的后端，向前推；另一部分人用绳子栓住桥板前端，将桥板掀起，用力向后拉，向六米多宽的外壕放去。由于桥板上下晃动，移动困难，加之敌人四挺机枪向我严密封锁，一班架桥数次未成。时间不等人，排长令三班接替一班架桥。三班研究了一班的经验教训，在我火力掩护下，成功地将桥板推向北岸，桥板短了一截，掉进了外壕的半腰，战士侯殿经手持梯子，冒着枪林弹雨，跳进壕内，用梯子抵住桥板前端，三班战士纷纷跳下炸塌的沟沿，用肩膀扛起了便桥，保证全连顺利通过。

火光中，三排战士扛着木梯，迅速通过外壕，逼近城墙根下。此刻，城上敌人一片慌乱，哨子声，咒骂声，惊恐的嚎叫声搅在一起。两边的机枪也向八连侧射，南门的敌人也涌了过来。三排立即把梯子搭在六米高城墙上，敌人则在城上用长杆子推梯子，敌推我架几个回合后，三排十多个人竭尽全力把梯子按住。敌火力更猛，我两名同志光荣牺牲。城上敌人把成堆的手榴弹夹杂着毒气弹投在三排战士们身边，他们以神速的动作踢开手榴弹，踢向壕沟内。

梯子刚一架好，二排五班迎着敌人的枪弹向前冲去，突击组的第一名是班长吴兴中，他高喊：“杀出一条血路，彻底消灭日本鬼子！”张桂林紧了紧他那二尺半长的大棉袄，往腰里塞了8颗手榴弹，也窜上了梯子。

这时，敌人见我们的战士正顺着梯子往城墙上爬，急忙把浸满煤油的棉团点

燃，顺着梯子推下来。火团落到吴兴中身上。勇敢沉着的吴兴中把头一偏，用枪把火团拨开，不顾身上冒着火焰，继续向上攀登。离城头越来越近了，敌人慌了神。10多个敌人慌忙抱起一根大木棒拼命地推梯子，一下把在梯子上的我军战士悬在空中。“不好！”城下的同志一声惊呼。“要竭尽全力把梯子扶住！”陈副连长果断地指挥战士们一齐拥上前去，把梯子紧紧地稳住。同时，我们的火力组一阵猛烈射击，把推梯子的10多个敌人全部击毙。冲在前面的吴兴中趁势飞速向上爬去，但就在他接近城垛时，冷不防被敌人砍了一刀，顿时鲜血顺着他的胳膊流到手上，又滴在梯子上。这个壮实的汉子，想赶忙抓住梯子，但是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只见他身子晃了两晃，一脚踏空，顺着梯子坠了下来，摔进了壕沟里。紧跟吴兴中后边的张桂林，把牙齿咬得嘣嘣响，不停的喊着：“上啊！”他抱定了一个念头：“死了就死了，任务怎样也得完成。”当接近城垛口，他突然把身子向下一缩，飞速地朝城上甩出了几颗手榴弹，随着一串的爆炸，浓烟飞腾，他双手把住城垛，“飞”上了城墙，“糟了！”张桂林自忖道，登上城头的他没带枪，手榴弹也已经打光。这时，城墙上的敌人正东奔西逃乱成一团，黑影里一个家伙斜挎着大枪，抱着一大筐手榴弹跑来，嘴里还不住地喊：“稳住！稳住！”张桂林顺手拾起一块砖头：“你给我稳住吧！”照那敌人脑壳狠狠砸去，那家伙“哼”了一声栽倒在地，爬起来又跑了。张桂林迅速从敌人丢下的一筐手榴弹中拣起几枚，堵住敌人的岗楼，把手榴弹塞了进去。然后背靠城垛仔细观察，只见10多个敌人从东炮楼方向冲过来。他急忙投去两枚手榴弹，一下炸倒了两个敌人，剩下的敌人吓破了胆，趴在地上不动了。过了一会，在敌指挥官的威逼下，这伙敌人又从地上爬起来，向张桂林冲来。这时，我八连六班的杜复显、侯殿经、刘传德、耿敬玉、孙吉亮、张金堂、于学美7人陆续登上城头，立即同张桂林一起在城墙上与敌人展开激战，击退反冲之敌，把敌人堵在了城墙的两端。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敌人发现我们只有少数部队登城，便集中两翼的全部机枪火力封锁我登城的道路，登城的梯子被打坏了，我登城后续部队被切断。

在张桂林登上城头的同时，马头日伪300多援兵已攻进了郟城西关，教二旅旅长曾国华亲自率领何万祥突击队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间不容发，张桂林同战友能不能守住这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狭小突破口，面临着—场严峻的考验。

先是东南角大碉堡里出来一股敌人，向我8名战士冲击。敌人被我勇敢的战士们一排手榴弹炸了回去。接着，从南门楼方向又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显然，那里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正在组织力量准备向我8名战士反扑。这时，我们的8名战士意识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硬拼是不行的，只有想办法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为后续部队登城创造条件。因此，他们立即抢占了一个敌人的掩体，用碎砖乱石和敌人的尸体挡住通道，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不一会，南城门楼的敌人一窝蜂似地向他们拥来。张桂林同战友依托刚刚改造的工事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这时，城东南角的敌人也趁势攻来。六班战士腹背受敌，情况危急。就在这时，我城下又重新架起梯子，贺东生团长和陈副连长亲自率领二排增援上来，与8名战士一起，很快把敌人击退，并立即向南城门的敌人猛打猛冲过去。以迅速勇敢的动作巩固扩大了突破口。敌不支，纷纷向城里败退。陈副连长命令七班迅速迂回至门南北边，并亲率四、六班向南门攻击，一举占领南门，击毙城门守敌7人，俘50余人，打开了城门。七、九连立即突进城内，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四团三营亦将北门攻占。战至拂晓，城内南大街一带已被我六团控制。

20日晨，残敌依仗院落和房屋负隅顽抗，以各种武器封锁街道巷口，并组织兵力向我反扑，我部队前进受阻。于是，八连利用短暂的时间召开了干部会，分析了敌人企图，采取了挖墙掏洞，逐屋占领的战法。同时，组织了特等射手，利用高房屋脊封锁要道、房门，阻击敌人。三班特等射手侯殿经一枪打死一个伪军官，他选好角度，又一枪击毙两名来拉尸体的伪军。这样，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快了向纵深发展的速度，经数小时激烈战斗，南大街一带敌人大部被我六团生俘。残余的日伪军，分别龟缩在伪政府的炮楼内，不断发射小红伞信号弹，固守待援。八连按营指示，又召集干部研究了敌情，察看了地形，重新组织了战斗。令一排在炮楼东南，二、三排在南面对炮楼攻击；张桂林他们班进行爆破。规定全连以爆破声为令，向鬼子炮楼发起冲击。机枪手和特等射手对准炮楼枪眼射击，压制敌火。一声巨响，六班在火力掩护下，爆破成功，炸死鬼子12人，活捉日军小队队长等两人。此时，四团一部将伪政府院内之敌歼灭。上午10时许，战斗胜利结束。

八连迅速转移到城北，阻击由临沂来援之敌，掩护我主力转移。次日10时，企图报复之日寇，以装甲车三辆引导步兵200余，向郯城扑来。八连以麻雀战术与敌周旋，歼灭一部，迟滞了敌之行动。当敌大部队赶到，我主力已经转移至马陵山区。张桂林与战友边打边撤，安全与团主力汇合。

郯城战役，毙伤日伪军103人，俘日军7人、伪军419人，缴获机枪2挺、掷弹筒2个、长短枪579支、汽车4辆及其他一大批军用物资。

除了郯城战役之外，张桂林还参加过许多次战斗，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指定的任务，在甲子山战役攻击草岭前战斗中，他受命带领三个同志，冒着敌人的枪弹抢救伤员，反复几次，救出了多名伤员。在攻击纸房北山碉堡时，他的任务是为攻击部队清理障碍。敌火下运动，他将鹿砦清理干净，部队却后撤了，当第二次攻击的时候，敌人又重新设置了鹿砦，他主动冲向前去，为部队开辟了道路。在攻打日照灵山铺据点时，他带突击班砍开了敌人的铁丝网，冲进了敌人的暗壕，军情有变，奉命撤退，撤出战斗后，排长清点人数，告诉他可能落下了伤员，他奋不顾身，再次冲进战场，寻找战友，当确认没有人落下，他已身处敌人的包围圈中，凭着机智勇敢，他匍匐出来，追赶上队伍。

1944年8月在山东军区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上，记者采访他时，他仍旧谦虚地说：“那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圆圆的脸发着好象羞涩的红润，宽大的鼻头，略向外翻，眉毛向上挑着，配合上矮矮的身材，给人以结实、诚朴的印象。

招远县史记载：张桂林后来牺牲了，时间地点不详。

记忆中的老建筑

沂州集柳碑亭

本 编



集柳碑亭在普照寺內即王右軍故宅中臥金普照寺尚仲汝撰集柳公權書僧覺海立於地震之側亭旁古槐為物時

金皇统四年（1144年），沂州普照禅寺主事和尚妙济禅师觉海对寺院进行扩建和修缮，一面请仲汝尚撰写《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的碑文，一面奔波集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墨迹。觉海对唐朝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书法极其推崇，他只能不辞辛苦搜集柳公权的墨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搜集齐了大小相仿的柳体字，集成了《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全文，最后邀请名刻工精心雕刻在石头上，这块石碑便被世人称为“集柳碑”。因西安碑林里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因而临沂的《集柳碑》被称为“东柳”。

觉海把石碑竖立在寺院中庭，并筑起亭子加以保护。集柳碑在1668年郟城大地震中倒塌断裂成数块，后来虽然经过精心修复，但是仍然有残缺碑文不能补全。抗战时期日军险将石碑盗走。

“文化大革命”时，集柳碑被彻底损毁。

嘉树堂藏《元拓足本金普照寺碑》 略说

陈麦青



相比中国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那件唐僧怀仁摹集王羲之书迹刻成的《圣教序》而言，被近世金石碑版研究名家叶昌炽誉为“金碑第一”的集柳公权书《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碑，也许有还点不那么广为人知。其实，这不仅是一件书刻俱佳、能传柳字神貌的杰构，且其存世的精善之拓，更为稀见。昔吴湖帆先生曾题自藏《金拓蜀先主庙碑足本》，其中有“宋辽金元碑，世存石刻不及魏、唐十之一，拓本且可遇而不可求，况旧拓乎”诸语，似亦可借用喻此。

—

此碑通称《沂州普照寺碑》，刊立于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仲汝尚撰文，程暉篆额，仲汝羲刻石。元代于钦所撰《齐乘》一书中，已见称引，而明赵崡《石墨镌华》、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等，皆有著录跋语。《石墨镌华》评曰：“唐文皇旷世雄才，削平海内，以其余力，恣意临池，其臣又有率更、永兴辈共成之，故能集书《圣教》，师法千秋。自此而后，集书者未有及之者。《普照寺碑》建自金源，当兵戈草昧之后，有仲汝尚，文颇尽致而集公权书，方正道劲，紧密处殊胜公权书，不啻与《圣教》代兴。”《庚子销夏记》中，更称其“方整秀劲，宛如公权手迹。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胜唐僧怀仁”。至清末叶昌炽《语石》，亦谓：“金源虽与辽同起



朔方，戎马之余，颇能讲求文字。《沂州普照寺碑》，学柳诚悬，世有出蓝之誉，金碑第一。”其集字之妙，堪与《圣教》比肩；而书艺劲秀，洵属一代名迹。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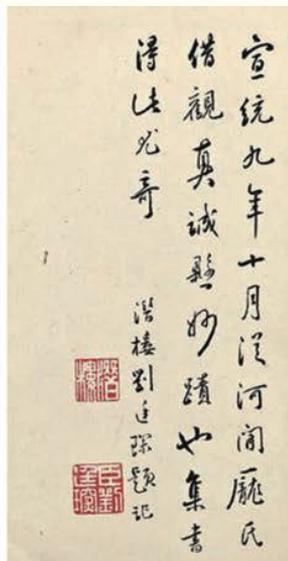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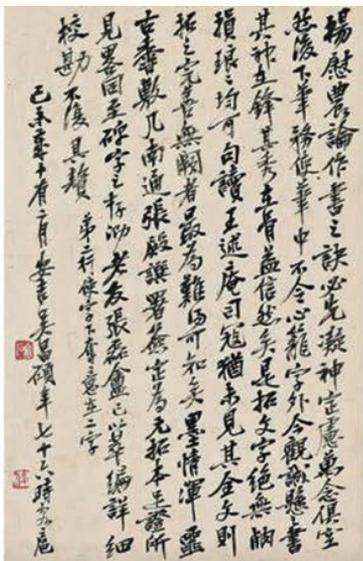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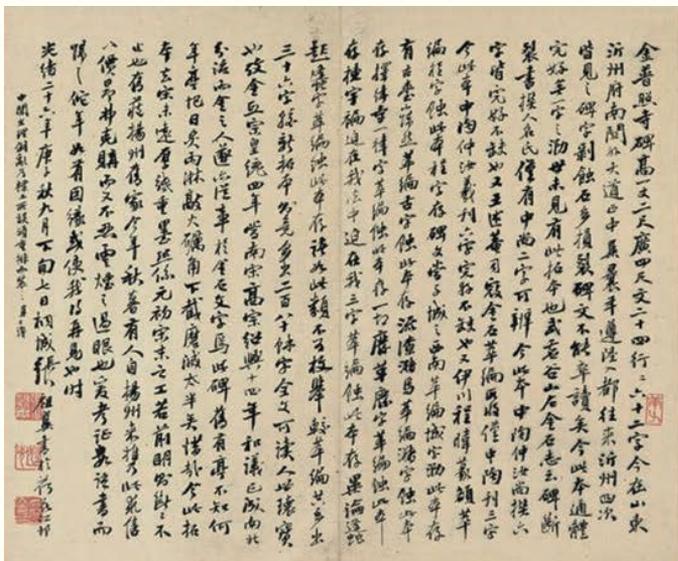
据王昶《金石萃编》所记，“碑不连额高一丈二尺，广四尺；文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书，篆额。在沂州府普照寺。”民国初所修《临沂县志》卷十二“金石”中，亦著录碑文，称“此碑为临沂著名石刻，字径约一寸五分，集柳诚悬书，殆犹怀仁之集右军书也。笔姿秀劲，体势开张，临池家奉为圭臬”。且记：“康熙七年，地震碑碎，乃葺亭厦之，以留永久，存乙种工业学校内，即普照寺旧址也。”然上世纪80年代，包备五先生以其对山东境内各处历代石刻遗存的多年实地踏访，成《齐鲁碑刻》一书，却未及此碑。上世纪90年代，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十六册金代石刻中，亦仅收一残石拼合的整张之拓，称“碑在山东临沂，拓片通高378厘米，通宽114厘米……此本额失拓，碑碎裂，此本搜得二十余块，缀合而拓”。据传原碑于“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砸碎后，现已无存；今所见者，皆依昔日拓本，重刻复制。而民国《临沂县志》记“康熙七年地震碑碎”，则其始断，当早在清初（1668年），然自乾隆末武亿《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谓“碑断裂”之后，遂多有定其断于乾隆年间者，虽何义门（焯）《庚子销夏记校文》中，记“此碑康熙戊戌地震，断而为二”。亦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之事，今检民国《临沂县志》卷一专记该县历代地震、旱涝、虫害等灾难的“通记”下篇中，有康熙“七年夏六月十七日地大震，倏裂倏合，压陷庐舍人物无算”，以及康熙九年、十年、十一年等地震记录，却未见康熙五十七年有地震之记，则何氏所记戊戌，可能为康熙七年干支戊申之讹，也可能系手民误植。《志》中还记此碑“康熙时仆于地震，篆额无存；道光时，又为恶僧刮洗，已非本来面目。迩来道光以前拓本，已非重价不能得，无论康熙以前也”。故传世善



拓，实不多见；未断全本，更属稀罕。方若《校碑随笔》仅记“旧拓本第三行‘断碑于土’四字未泐”。王壮弘先生《增补》则曰：“见明初拓本，全文可读。碑首‘陶仲汝尚撰，集唐柳公权书，伊川（笔者案：此“川”字《增补》各版均误植为“以”）程暉篆额’等字完全无损。此石乾隆间断裂，未断者乾隆前拓本也。”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所述，又稍更详：“明初拓本碑字完好，书体整齐。明末清初，碑少断裂；后继续断损更甚，字渐瘦。嘉庆初拓本四行‘断碑于土’四字不损，字尚佳。以后拓本字细瘦，近更细瘦，无法学习。见全文葛成修本，归北京图书馆；济南黄氏本，归山东博物馆；近西安古旧书店收一本。”由此，则《金石萃编》著录所据之本，起首“中陶仲汝尚撰”之“陶仲汝”“伊川程暉篆额”之“程”，以及最后“中陶仲汝義刊”之“仲汝義”等字，皆已泐坏不辨，而代之以方框空格，虽“断碑于土”四字犹得录存，但恐怕已是嘉庆初年之拓，不过尚未遭刮洗耳。

三

嘉树堂珍藏此碑旧本，分装两册，计碑文五十二开，题跋五开。有明代嘉兴李氏“日华君实之章”，清代金石学名家翁方纲“覃溪鉴藏”，以及嘉树堂主人陈郁先生考为清人黄钊的“黄氏珍藏”诸印，近世又经河间庞芝阁（泽銮）、合肥李木公（国松）递藏。不仅碑首“中陶仲汝尚撰，集唐柳公权书，伊川程暉篆额”，及碑末“中陶仲汝義刊”等，一字不缺，且字口风神，精采毕现；纸墨气息，质古沉黝，似非一般明拓所及，故册前张謇及磊龢（张祖翼）所署签题，皆以“元拓足本”“元拓精本全文”称之。册尾更有张祖翼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罗振玉丁未（1907）、刘廷琛“宣统九年”（1917）、陆恢及吴昌硕己未（1919）、褚德彝庚申（1920）、沈曾植辛酉（1921）诸跋，鉴赏评说，颇多赞辞。其中张祖翼之长题考校，先述亲历见闻，详勘碑字存泐；再及纸墨毡拓，兼记过眼始末，尤具价值。因录其文，以飨同好。



四

金《普照寺碑》原在山东沂州府南关外大道正中。翼曩年遵陆入都，往来沂州四次，皆见之，碑字剥蚀，石多损裂，碑文不能卒读。今此本通体完好，无一字之泐，世未见有此拓本也。武虚谷《山左金石志》云碑断裂，书撰人名氏仅有“中”“尚”二字可辨。今此本“中陶仲尚汝撰”六字皆完好不缺。又王述庵司寇《金石萃编》所收，仅“中陶刊”三字，今此本“中陶仲汝羲刊”六字完好不缺也。又“伊川程暉篆额”，《萃编》“程”字蚀，此本“程”字存；碑文“当子城之西南”，《萃编》“城”字泐，此本存；“有古台岿然”，《萃编》“古”字蚀，此本存；“流潦潴焉”，《萃编》“潴”字蚀，此本存；“择律寺一”，“律”字《萃编》蚀，此本存；“一切废革”，“废”字《萃编》蚀，此本存；“栋宇褊迫在我法中”，“迫在我”三字《萃编》蚀，此本存；“异论蜂起”，“蜂”字《萃编》蚀，此本存。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较《萃编》共多出36字，较新拓本，则竟多出280余字，全文可读。考金熙宗皇统四年，当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和议已成，南北分治，而金之人遂亦从事于金石文字焉。此碑旧有亭，不知何年亭圯，日炙雨淋，敲火礪角，下截磨灭太半矣，惜哉。今此拓本去宋未远，厚纸重墨，恐系元初宋末之工，若前明，则断断不止也。旧藏扬州旧家，今年秋暮，有人自扬州来，携此求售，以价昂弗克购，而又不忍云烟之过眼也，爰考证数语，书而归之。它年如有因缘，或使我得再见也。时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秋九月下旬七日，桐城张祖翼书于荷花江邨。

至于张彦生先生所记已归北京图书馆之葛成修本、山东博物馆之济南黄氏本等，均属鉴藏名家旧物，更经张氏法眼，想皆精善。他日有幸获观，缘福之外，或得与嘉树堂本并论长短、试评甲乙，不亦赏碑一乐乎？

小沙东海战

大荒堂主

1943年3月17日拂晓，新四军三师团以上干部及部分战士共51人赴延安学习，途经赣榆县小沙东黄海海面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战斗中，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6名干部光荣殉国，其中还包括田守尧将军的夫人陈洛莲、张池明将军的夫人张明等4位女同志。彭雄等同志牺牲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新四军三师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们的遗体安葬在滨海抗日山烈士陵园。



1943年3月15日江苏阜东海边新四军三师赴延安学习干部队成员



1943年3月15日江苏阜东海边新四军三师赴延安学习干部队成员



彭雄



张池明和夫人张明



田守尧和陈洛莲夫妇



小沙东海战烈士冢

姓氏百家漫谈——孙姓 (一)

赵丹峰

一、孙姓渊源

孙姓系中华大姓之一，其得姓主要来自如下几源：

一是出自姬姓。据《元和姓纂》载：周文王第八子姬叔被封于康（在今河南禹州北），至周成王时又改封于卫（今河南卫辉），史称康叔。康叔的九世孙名慧孙。慧孙生耳，耳生乙（字伍仲）。伍仲为了纪念祖父慧孙，便以祖父名中的“孙”字为姓，其后代沿用，遂有孙氏一族。

二是出自半姓。据《世本》载：春秋时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本来姓半，字孙叔，任令尹期间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楚人所拥戴。其子孙为弘扬祖德，便以他字中的“孙”作为其家族的姓氏，即孙氏。

三是出自妘姓。系齐国田完后裔。春秋时，陈国公子田完因避祸而奔齐国，其四世孙（即齐桓子）生有二子：恒、书。书字子占，任齐国大夫。因率众征伐莒国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以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为食邑。自孙书始，这支族人便以孙为氏，且日后成为孙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族群。

四是出自子姓。商汤后裔比干被纣王杀害后，其子孙皆纷纷避难隐姓，有的认为自己本系王族子孙，故改为孙姓，这是孙姓的又一来源。

五是出自改姓。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有一支鲜卑族拔拔氏在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时，被改姓孙氏。在当代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亦有姓孙氏者。

二、孙姓郡望与堂号

孙姓族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代表性郡望，其中以乐安孙氏、太原孙氏、东莞孙氏、吴郡孙氏和汲郡孙氏为著名。其中东莞孙氏世居今山东莒县一带，是孙臧的直系后裔。

孙氏遍布中华大地，除上述郡望外，还形成了诸多堂号，其中平治堂和富春堂最负盛名。上述两大堂号，均与两位孙姓历史名人有关：前面说过，因孙叔敖在任楚国令尹时治国有方，政绩卓著，其后裔为传承祖上懿德，便以“平治”二字作为本族的堂号。富春堂这一堂号则与兵圣孙武有关。孙氏在齐得姓，后因齐国发生内乱，此支孙姓族人便逃至吴国，世居富春（今浙江富阳）。伟大的兵学家孙武，正是在齐国发生内乱时逃奔吴国，受到吴王重用，并在日后的吴楚争霸战中展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的。作为一代兵圣的后裔，富春孙氏为有孙武这一伟大先祖而感到荣耀，于是“富春堂”这一著名孙氏堂号便应运而生，并传延千载。

三、族群繁衍与发展

姬姓孙氏（卫）和妫姓孙氏（齐）分别发源于今河南和山东两地，并繁衍发展。春秋末，世居河南的姬姓孙氏因在卫国失宠而北迁晋国。妫姓孙氏则分别在山东和浙江蓬勃发展。秦汉后，妫姓孙氏作为中华孙氏的主力，开始衍布至湖北等地。三国时期，由于孙氏东吴政权的创建使孙姓族群得以在江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至唐代，孙氏族人开始迁居江西、福建和广东。到宋代，孙姓族群已遍布大陆各地。明末清初，孙姓族人开始迁入台湾繁衍发展，并陆续迁徙到东南亚地区。目前，孙姓总人口约1800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其规模在全国各姓氏中居第12位。

四、孙姓名人纪略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式微，强大起来的诸侯纷纷起而争霸，逐鹿中原。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架构，使得此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自由驰骋，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时称兵家）。以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论，在军事家中当首推孙武。孙武，世称孙子，字长卿，齐国人，因内乱而逃奔吴国，由伍子胥推荐给了吴王阖闾，孙武向吴王进呈自己所作的兵法十三篇，获吴王称许。吴王虽对孙武所著兵法中的论兵之道深为折服，但对其指挥军队作战的实际才干并不清楚。为了验证其才能，吴王初始时并未给孙武调拨军士，而是将180名宫女交其操练。孙武深知吴王用意，便不动声色，领受了训练这批娘子军的任务。孙武将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位美姬分任队长。随后，孙武即下达口令，擂鼓操练。两位担任队长的美姬及众宫女不循军令，相互嘻戏耍闹，队伍顿时乱作一团。孙武见状，遂厉声喝道：军中无戏言，违令者斩！即下令将两位担任队长的美姬予以斩首，以肃军纪。而后又重新任命了两位队长，继续进行操练。宫女们见孙武治军如此严明，便一一敛行肃立，悉听号令。很快，孙武就将这群宫女训练得阵容整齐，英姿飒爽，进退有序，令行禁止。吴王对孙武的治军手段极为佩服，虽然失去了两位爱姬，但他仍任命孙武为大将军。公元前506年，吴王令伍子胥为主谋，令孙武为大将军，大举伐楚。吴军在孙



孙武



孙臧

武指挥下，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五战五捷，大溃楚军，一举攻陷楚国建都约200年的郢城（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区西北）。

孙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深谙变革之道的杰出政治家。一次，吴王阖闾就晋国六卿（即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家掌握晋国大权的家族）所进行的土地变革问题，与孙武进行了一次长谈。吴王问孙武：日后晋国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孙武遂对晋国六卿所各自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范氏、中行氏两家亩制最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但收取的租税却最重，高达五分抽一。亩小而税重，人民负担太重，必定导致众叛亲离，人亡政息。其他顺次如知氏、韩氏、魏氏较之前两家亩制虽稍大一些，但税率亦与五分抽一差不多，人民负担依然过重，这种制度是不会持久的，最终还是要步范氏、中行氏之覆辙。与上述五家相比，唯有赵氏是个例外。赵氏所实行的亩制最大（以240平方步为一亩），亩大而税轻，公家取民有度，民众自然安居乐业。苛政可丧民心，宽政可得民心。晋国的政权最终要归于赵氏手中。吴王听后，深受启发，连连称是。这一史实见于临沂市区西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孙武对当时与后世的最大贡献是其所撰著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兵学经典，《孙子兵法》是在对春秋时期千百次大小战争成败经验与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篇幅虽只有5900余字，但内涵却极其宏富、深邃。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战争必须以国内政治为基础。他认为，作为军事统帅，一定要注重了解情况，对敌我双方的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要了如指掌，加以权衡，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强调战场形势是千变万化的，指挥员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调整战略战术，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即属此理。孙武十分注重军队士气的作用，认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故对敌方要“避其锐气，击其惰性”，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孙子兵法》十三篇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与《老子》五千言同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武亦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孙子兵法》自问世后，备受中外兵家重视，被誉为“兵学鼻祖”。在当代，不少海内外商界精英还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精髓运用于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下流行的“孙子热”即是证明。

战国时期，孙氏族中又走出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齐国军师孙臧。孙臧

系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之裔孙。其原名不详。他早年曾与庞涓同投于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后庞涓辞师到魏国，小试身手，即得到魏惠王的信任，被拜为将军。庞涓生性阴诈，心地险恶，他忌妒孙臧的才华，将孙臧视为自己仕途上的潜在威胁，为除后患，他将孙臧诬至魏国，非但未向魏惠王举荐孙臧，反而派人将孙臧处以臧刑（剜去膝盖骨），故世人遂称其为孙臧。为保性命，孙臧佯装疯癫之状，以迷惑庞涓。后有齐国使者至魏，将其秘载车内归齐，被齐国大将田忌作为上宾留于府中。一日，齐威王与田忌约定进行赛马，比赛按照马的优劣分为三场进行。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皆比田忌的马强壮，故而之前数次赛马均以田忌失败而告终。在此次赛前，田忌想到之前的败迹，心中很是惧怯。这时，孙臧给田忌出一主意，使田忌反败为胜：按孙臧所嘱，田忌在首场比赛中，先以自己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自然是田忌先输一局。在第二场比赛中，田忌以自己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结果是田忌取胜。在第三局比赛中，田忌又以自己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又胜一局。最终，田忌以三局两胜一负的总成绩首次赢了齐威王。齐威王问其缘由，田忌便告之此主意系孙臧所出，齐威王奇之，遂拜孙臧为齐国军师。在日后进行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孙臧因指挥齐军先后两次大胜魏军而名扬天下：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了战争，迫卫国向赵国屈服称臣。魏国闻之盛怒，遂举重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翌年，已陷绝境的赵国向其友邦齐国求救。齐威王即派田忌为主将，孙臧为军师，率兵救赵。临战前夕，孙臧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邯郸虽被魏围攻危在旦夕，但魏国经一年围伐，亦是兵疲将乏。此时，我师与其直奔邯郸，直接同魏军主力交战，不如采取“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策略。孙臧指出，此时魏军的主力均放在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方面，其后方已呈空虚之状。我军可迅速进军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据其衝路，冲其方虚。这样一来，魏军见其后院起火，势必被迫回师自救，邯郸之围便可自行解除。待魏军长途跋涉撤军回国时，我们正可于途中设伏，给予其以沉重打击。田忌认为此计甚妙，遂率军直扑大梁，又联合宋国军队会合齐军攻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对魏形成夹攻之势。十月，围攻邯郸的魏军闻后方告急，遂由庞涓率魏军主力回救大梁。当魏军行至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时，早已埋伏于此的齐军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魏军发起截击，一举将毫无防备的魏军击败，并生擒庞涓（见临沂西汉墓出土竹简《孙臧兵法·擒庞涓》）。此役亦称“围魏救赵”之战。这一战法被后世广泛借鉴运用。

马陵之战发生在桂陵之战的12年后。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魏国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不敌，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问孙臧，孙臧答曰：“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齐国先不要马上出兵，而应首先向韩国表示定会出兵相救，以坚定韩竭力抗魏之决心，待韩国处于危亡之际时，齐再发兵救韩。这样做，“尊名”与“重利”可一举兼得。后韩与魏交战，五战皆败于魏，危急关头，齐国方派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军，孙臧为军师，率重兵直接奔袭魏国都城大梁。庞涓闻讯，遂放弃攻韩，班师返国。魏人迅速动员组织起重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臧对田忌说：三晋（即赵、魏、韩三国）之兵素来剽悍勇猛，齐国士兵则被认为相对怯懦。善战者须因势利导。《孙子兵法》曰：“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于是下令全军：我军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饭可修十万个灶，第二天要减为五万个灶，第三日再减至两万个灶。军士遵命而行。庞涓率魏军追击齐军三天，见齐军饭灶逐日大减，遂大喜道：“我向来知道齐军过于胆怯，入吾地仅三日，其士卒已逃亡大半矣！”于是乃扔下步兵，亲率轻骑精锐，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臧估算，魏军于当晚可到达马陵（史家一般认为其遗址在今山东范

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北大名东南，还有持在今山东郟城以东之说者）。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要，极宜于设伏打阻击。于是孙臆挑选了一万名善射士卒埋伏于道路两侧，约定天黑后一见火把亮光即万弩俱发。又派人刮去一棵大树上的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下“庞涓死此树下”六字。庞涓果然于是日晚赶至此树下，看见白树干上隐约的字，便令士兵举火把照看，还未读完，齐军即发箭如雨，魏军士卒纷纷中箭倒地。魏军大溃，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拔剑自尽。临死前喟然长叹道：“遂成竖子之名！”齐军随后乘胜追击，计歼敌10万余人，并俘虏了魏军的主帅太子申。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典战例，是孙臆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

作为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兵家，孙臆留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他撰写的《孙臆兵法》。《孙臆兵法》又称《齐孙子》，是孙臆在继承孙武、吴起等先代兵学鼻祖的军事学说和总结战国时期一系列战争经验及自己丰富军事指挥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辨与理论升华的结晶。据《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1972年4月，在临沂市区的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孙臆论兵法的竹简。经整理成《孙臆兵法》，共16篇，294简，基本体现了孙臆的军事思想。孙臆认为，根据历史经验，奢谈仁义礼乐并不能制止战争，只能“举兵绳之”，即用战争来制止侵略；孙臆强调“事备而后动”，即在战前务要做好各种准备，否则就会失败；他坚持“战胜而强立”的建军理念，认为只有“富国”方能“强兵”；主张因情用兵，如采取避其锋芒，制造假象，示弱而惑敌等，以争取主动，用兵时则“必攻不守”，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等等。孙臆的兵学思想，在古今军事学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本人亦被誉为和孙武、吴起并列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学家。

记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姓名人，还有一位贤达不可阙如，他就是春秋中期秦穆公的大臣孙阳。说起孙阳，绝大多数国人似乎觉得这一名字比较陌生。但若一谈起伯乐，又几乎是妇孺皆知。其实，伯乐即是孙阳。“伯乐”本系天上的星名，据说专司掌管天马之责，由于孙阳乃秦国著名的相马家，因此人们便尊称其为伯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的人们便只知伯乐，而不知孙阳了。孙阳不但善相马，而且极识人才。暮年时，他推荐九方堙为秦穆公相马。九方堙相马因不辨毛色雌雄而引起误解，孙阳便解释道：善相马者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后经骑用，九方堙所相的那匹马果为千里马。又例：一次孙阳乘车路过一地，见一瘦马拉一车盐巴缓慢而行，孙阳近前观看后遂惊叹道：“此乃一千里马也！”他迅速跳下车来，脱下袍子披于瘦马身上，为千里马遭受苦难委屈而痛哭不已。不料此马见孙阳辨识其价值，遂昂首伸颈大声嘶叫，声音直冲云霄。由于孙阳既善相良马，又能举人才，遂受到秦国朝野高度赞誉。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其《杂说》之四《马说》中这样感叹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从此，“伯乐”便成为善于识才荐贤者的代称，历代相因，沿用至今。

袁芳烈与温州模式

沈绍真



袁芳烈，1929年11月出生于沂南县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参加革命，1950年南下浙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他曾任浙江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农委主任、党组书记，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然而，在这些耀眼履历中，最让人称道的是他改革开放后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岁月。

袁芳烈于1981年担任温州市委书记，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发展争议很多的情况下，解放思想，排除干扰，锐意改革，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极大地激发了温州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的新局面，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袁芳烈同志秘书、温州市委原副秘书长王运正说：“‘温州模式’的形成，他是一个开创者和奠基人。”

温州民生，路在何方

1981年8月6日，身为浙江省省委常委、分管农业副省长的袁芳烈抵温履新。

那时的温州是“文革”重灾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群众生活困

难。中央和省委多次收到群众来信要求解决温州问题，为此省委常委会曾多次研究温州问题，并决定从省内其他地、市选派得力领导干部赴温州任职。但谁都知道温州是个烫手的山芋，结果很长时间没人愿去。在一次研究农业工作时，省长对袁芳烈说：“有人提议你去温州。”袁芳烈干脆地说可以，省委叫我去我就去，在哪工作都一样。

其实温州还面临严重的民生问题，“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以及鹿城“坐着倒霉（煤），站着等死（水）”“温州死（水）路一条”这流传一时的民谣是温州民生现状与社会心态的苦涩概括。袁芳烈闻之动容，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中心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履新温州的市委第一书记，眼见民生困顿，袁芳烈在解决班子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思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问题。

但条件差，底子薄，温州路在何方？

他说，一番调查研究使他有了信心。在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中，他看到、听到了许多以往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物，如“重点户”“专业户”“挂户经营”“供销员”……

在瑞安马屿，他与市委副书记吴俊祥看到了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询问之下，得知这些牛大多是户有户养也有公有私养（承包）的，户主自豪地说：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生一头小牛又能卖500元、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比一个“三五牌”干部（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都强了！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顺手推开路边一农户的门，一位老太太还照看五台土织机一边织松紧带还带着孙子。问一年能赚多少？她一伸手指得意地说6000！而设备投资才500元。袁芳烈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还多啊，但我不眼红还要为你高兴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在召开市“两户大会”前，他到了苍南宜山，住在军分区战士陈欣家的小楼上，半夜里但听人声鼎沸，起来一看，见远近灯火通明，男女老少，穿梭往来，健步如飞……他还听说宜山区现有几万人在搞家庭纺织，产值达8000余万元，人均收入300多元。

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袁芳烈十分高兴，这就是温州的希望所在！

20多天的走访调查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也使他觉得有了办法：那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创造精神。解放思想，狠抓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他决定将这确立为市委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

余悸犹在，计将安出

农村的新事物使人看到了希望。但这毕竟还是少数现象，尽管三中全会已开过，多年来“左”的一套所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除，因发财致富而遭受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事使干部群众普遍地心有余悸，人们对刚刚抬头出现的新事物还有着深深的疑虑。大多数人还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富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如何使三中全会精神尽快贯彻落实下去？如何使更多的人能像塘下老太太、宜山农民那样放胆地去干？这是袁芳烈日夜思考的问题。

1982年12月，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和专业户），用“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

虑。但会议通知发下去后，却普遍反映许多“两户”代表不敢来参加会议，甚至说市里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了，上半年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了，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

袁芳烈就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也挂出了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有1200多位“两户”代表前来与会。袁芳烈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十二大精神，并大力宣传劳动致富、允许经商办厂的新政策，他还特别称赞“两户”是温州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会议表彰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还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接着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新政策……会后各县效仿市委也纷纷召开各县“两户会议”宣传动员、表彰先进……被“左”的思想冰冻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办厂、开店。当时瑞安塘下有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厂，在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一下子有四五十人出来独立办厂。

但此时“八大王”事件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1982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柳市被作为重点打击地区，八个经营冒尖的能人被冠以大王名号，分别以投机倒把等罪名将他们判刑并抓捕入狱。“八大王”事件在干部群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以至于在传达市“两户”会议精神时，不少干部群众就说“共产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共产党不许大富，‘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看来一个“两户会议”还不足以完全驱除“左”的阴影，于是袁芳烈把目光投向了“八大王”事件。

1983年春节刚过，他就亲自去了柳市，区委书记吴良志向他汇报了“八大王”案件的前后情况。吴良志还说，抓了“八大王”后柳市当年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柳市刚刚掀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一下子被这瓢冷水给泼下去了！听了这些袁芳烈有些坐不住了，他想市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这“八大王”事件的影响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回到市里，他当天就找了市中院院长孙沧。他向孙沧讲了在柳市了解的“八大王”情况，说现在看来对“八大王”的处理是有些问题。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改，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孙沧立即进行研究，组织力量对“八大王”案进行了复查，并依据有关法律在1983年上半年依法作出改判，宣告“八大王”无罪，发还其钱物。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在1984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市委公开宣布给“八大王”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作了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

给“八大王”平反这事的面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很大。若干年后南存辉对袁芳烈说：“‘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正泰前身），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

“八大王”平反后，在市委市政府“争创富民书记活动”号召的推动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品多营等区域块状经济很快出现，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形成，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在温州城乡出现。

姓资姓社，是进是退

温州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做法及成果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上世纪80年代

初，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对温州“姓资姓社”的质疑指责也从未间断。作为参与省委最高决策的省委常委成员，袁芳烈清楚地知道班子内部有些同志对温州做法持保留甚至不赞成态度。

那年，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来温考察，黄对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模式赞不绝口，临别时黄璜对袁芳烈说：看来是学南容易学北难啊（南指温州，北指苏南），我们要学温州经验……袁芳烈笑着对他说：学南也不容易，弄不好要付出政治代价啊！

袁芳烈说，1982年他出席党的十二大，亲耳聆听邓小平、胡耀邦的讲话。他们的讲话充分肯定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成就，说农村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这些话给了他极大鼓舞，心里更豁达了，对所谓姓资姓社问题有了坚定信念，温州姓社不姓资。他也就更坚定地认为：温州底子薄，基础条件差，只有依靠群众发展商品经济，除此之外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阳过去30万人出去讨饭，现在经济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了，这有什么不对？温州符合这个精神，温州的发展道路体现了我们党一直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所以不管上边怎么说，也明知有人反对，他还是坚定不移。他说我们要替老百姓着想啊，老百姓要吃饭啊，当干部的要务实精神，有奉献精神。

当然，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做法一直得到中央高层和许多领导的赞赏和支持，如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对温州的做法就一直是肯定和支持的。

许多中央领导对温州的支持肯定也是袁芳烈所难以忘怀的。1984年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来温，袁芳烈陪同他看了柳市，张劲夫对沿街摊、店的生产经营逐一询问，高兴得赞不绝口，说：“老袁啊，你们是怎么搞起来的，要好好总结经验……我们国家发展工业的路子不对，你们这样不是很好吗。”袁芳烈说：“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些产品质量不好，管理也没能跟上。”张劲夫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街道弄堂工业的产品质量就不好，瑞士手表不就大都是弄堂工厂生产的吗，质量不是也很好么？”

1985年杜润生、吴象等来温考察，杜老看后极为兴奋地对袁芳烈说：“老袁啊，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全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到，为什么到你这个温州就到处都是啊！”他端起酒杯风趣地对袁芳烈说：“我们两个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

杜老还说万里同志很想来温州看看，但到了上海生病来不了，问怎么办。袁芳烈说：“好办，我把商品市场情况拍成录像带派人送上海向万里同志汇报。”

他就派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去上海，万里同志很重视，看了录像听了汇报，对温州作了重要指示。

1986年4月，万里亲自来温视察，又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温州发展经济所走的路子，使温州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那时袁芳烈已调离温州，回到省城工作。

袁芳烈在温州只有短短4年多工作时间，但他所表现的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大力改革的执政作风却给温州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袁芳烈调任省委政法委工作，后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99年离休，2009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精明”之玉壶冰心

——记李松奎

刘凤才

《黄帝内经》曰：脑为“奇恒之府”“为髓之海”；“头者精明之府”，“心神所居”。所谓“心神”，即指人的精神意识与思维活动。李时珍曾经更加明确地说：“脑为元神之府”。中医把“心”分为“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其中所称“神明之心”即指大脑。现代医学认为，人的意识思维是大脑的功能。祖国医学把人的意识思维归之于“心”，并非仅指解剖学的心脏，而是把大脑的一部分功能归之于心脏。“奇恒”“神明”“元神”等疾病，即为现代医学所说的“神经科”疾病。治疗这些疾病，需要医者之心必须是一颗纯真仁慈之“冰心”，医者大脑必须是一副“精明”思维之府。而临沂市中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学士李松奎，恰恰就是具备了这样“一片冰心”与“精明之府”的杰出人物。他还兼任中华医学会山东省临沂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沂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临沂市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是政协临沂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李松奎为人特谦和，谈吐很低调。谈起他30多年的从医生涯和取得的成绩，他反复地说：“天天与病人打交道，治好了多少病人哪能记得清楚，治好了是



应当的，治不好心中却总过意不去。”语出平淡而真诚，但是正所谓“潭深波浪平、学高语声低”，这更反映了一位造诣高深的专家其胸襟与学识的深远博大。

一、一片冰心在玉壶

李松奎1962年出生，祖籍寿光县，但他生于沂蒙山长于沂蒙山，是典型的沂蒙山杏林之秀。他所以从一个普通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先生”，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立业先立德。而他在医德上的楷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李松奎的父亲叫李智荣，早年毕业于潍坊医校，响应上级支援沂蒙山区的号召，1958年来到费县，从事疾病防疫、当时主要是丝虫病防治工作，后来被组织上安排到方城人民公社医院，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父亲医术很高，经验丰富，医德尤佳，口碑甚好，在方城一带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李松奎清楚地记得，他小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下雨刮风，还是大雪飘飘，深更半夜里常常有患急病的乡亲们来他家敲门，父亲总是像战士听到紧急集合号，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就跟着来人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他有时不解地问：“爸爸，就不能等到白天再去看病人？”父亲总是认真而和蔼地告诉他：“治病如救火，当医生就不能懒惰，不论什么时候，对病人就得随叫随到。”这是李松奎至今记忆最深刻的父亲对他的教诲。

1978年，李松奎高中毕业。到了报考大学时，他对自己未来的目标与志向心中尚不明确了然。没想到，父亲亲自给他选定了志愿：“学医！”李松奎这才豁然开朗：有其父就得有其子，就得像父亲一样，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当个好医生！

1983年，李松奎从泰山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临沂地区沂水中心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尽自己的最大本事与努力，为广大农民治病，始终是他工作的原动力。1992年10月，医院组织新的一批医护人员组成下乡医疗队，到基层开展卫生医疗扶贫。李松奎担任了驻沂南县红卫医院医疗队队长，带领两名同事来到了沂南县马牧池乡。马牧池是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著名的根据地之一，是若干“红嫂”原型的故乡之一。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与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当时医疗卫生条件与技术水平仍然很差。刚刚到来不久，这一带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李松奎夜以继日，及时救治了许多患者。一天，李松奎路过排队化验的患者时，凭着职业敏感与临床经验，他一打眼就发现患者中的一个少儿脸色特别不好，精神十分萎靡。他立即走上前，把患者拉过来检查了一番，说：“病情都这么严重了，还排什么队？先抓紧治疗抢救！”说话间，小患者已经进入了休克状态。李松奎分秒必争地安排医护人员给孩子打针用药，采取急救措施。由于抢救及时，孩子转危为安，家长感激涕零。后来，省、市防疫站领导与专家来视察疫情与防治工作，对李松奎抢救患儿之事特意大加表彰。

还有一次，更让李松奎难以忘怀。一天，一位宫外孕患者因腹腔大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被家人紧急抬进了乡医院。此种情况，必须马上实行手术。但是医院里不仅没有必须的代血浆，连升压药都没有，进行手术必备的条件都欠缺。转院去县，或者向县院请求血源与药物支援，因当时正在修路，交通断续，道路坎坷，时间根本来不及。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孕妇的丈夫突然双膝一弯，“扑通”一下跪在了他的面前，说话都带着哭腔：“求求您李大夫，千千万万，帮俺救媳妇一命吧！”李松奎被这一幕瞬间感动得热血沸腾，果断地向院长建议：抓紧做好能做的准备，立足现有条件，立即为患者实行手术。他十分清楚，这样做个人要冒着很大风险，但是如果不做，患者的生命则面临更大危险。救人要紧，个人得失必须置之身后。院长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同意立即手术。当打开患者腹部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已经溢出的积血，足足装满了两个小盆。没有输血血源，李松奎灵机一动：把患者本身的血过滤一下，再为她输上。如此，足足为患者输入了1000多毫升血液。经过极为紧张忙碌的一番抢救，手术总算获得成功，保住了患者生命。

李松奎的爱人是沂水中心医院的护士。一天夜里，爱人值夜班，他陪着只有几岁大的孩子进入了梦乡。半夜12点钟左右，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从熟睡中惊醒。原来是蒙阴县

岱崮医院的医生带着一辆车，前来找他前去会诊。患者是岱崮医院的一位干部，突然发病，昏迷不醒。情况紧急，李松奎来不及告之爱人，也顾不上孩子，只能把屋里的电灯敞着，免得孩子醒来着急，随即与来者一起，星夜兼程，直奔大山之中的岱崮医院。等明确诊断、制定好治疗方案后，返回到家里时，已是凌晨拂晓。孩子仍然在熟睡，他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弹指一挥，33年过去，李松奎从一个普通医生，已经成为沂蒙山区神经内科的一代名家。随着成就不断显著，名气不断加大，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经他诊疗而恢复健康的人不计其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是，农村的同学们拿着几个鸡蛋换作业本与铅笔的情形，总是在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只要能治好病，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患者尽最小的代价，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不必要的钱”，是他对自己的最基本的要求。每当有患者前来看病，他总是先详细地询问病情病史，仔细分析病症病因，然后根据情况，提出诊治意见。不必要的检查，一律不查；不必要的药物，一律不开；不必要的手术，一律不做。有些患者不明病理病因，总是不放心，主动要求做这样那样的检查，吃这样那样的药，钱花少了反而觉得不踏实，李松奎就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劝告。有一些头疼头晕患者，本来生活就不宽裕，但为了诊治疾病，动辄就要求李松奎开脑电图、脑CT等检查，李松奎就问：“您知道脑电图和CT是检查什么疾病的吗？您这症状完全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做这些检查。”

二、一双慧眼辨疾患

李松奎深刻感到，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医生，真正担负起悬壶济世之责，只有满腔仁爱之心和良好愿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先祖黄帝所言：医道乃是“精光之道”“大圣之业”，必须下苦功夫、真功夫掌握博大精深的医术，不断提高诊疗水平，凭借真才实学，才能使自己的道德意愿得以实现。他30多年的从医经历，也正是一个在业务水平与能力上不懈地探索追求、历练提升的过程。

不下水不知水之深浅，不临床不知诊疗之难。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文革”结束不久，那时的医学本科生还是凤毛麟角，人们对他都高看一眼。原以为在学校学的知识应付工



作绰绰有余，诊疗一般疾病是手到擒来之事。但是一经临床，李松奎才发觉自己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尤其在理论到实践过程中，还有一段相当的路程要走。不同的疾病，常常表现出相同的症状；相同的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往往又表现得“千姿百态”。遇到一些复杂疑难的疾病，诊疗更加困难，常常不得“疑似”暂为处置。这让李松奎大大感受到了真正的压力与强烈紧迫感。为此，他一方面不耻下问，向经验丰富的前辈们认真学习；另一方面，他手不释卷，自觉地进行理论“再造”。白天在临床上遇到搞不明白、看不透彻的病例，晚上就带着问题向书本请教。宿舍里没有暖气，一到三九严冬，冷若冰窖。他就先穿上大衣，再钻进被窝，在知识的海洋中“冬泳”。为了便于读书和作笔记，他请父亲专门给他做了一张小木桌，担在膝盖上，边看边想边记。只要一捧起书本来，他常常是废寝忘食，熬到深更半夜甚至鸡叫三遍，东方破晓。

在学习上，李松奎从不“避重就轻”“避难求易”。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生理大“网络”；神经系统解剖，是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上最难掌握的一门技艺。李松奎则“骨头专捡硬的啃”，在这门技术上特别下功夫。其时，临沂地区最高的一所医学高等院校——临沂医专尚在沂水。每到学校上神经系统解剖课，他总是早早地赶到课堂，成为一名比在校生还认真刻苦的旁听生。在学生眼中，李松奎已经成了老师，见他还在吃苦受累地当“学生”，很不理解，问道：“李老师，你怎么还这么认真地从头学起？”李松奎微笑着回答：“等到你们参加了工作就知道了，学无止境，新的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新的学习的开始。”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1984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李松奎参加了国家卫生部组织的《中国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神经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重点是调查研究偏头疼、癫痫、脑血管三大类疾病。他跟随山东医科大学的曹教授，来到山东荣成县。半年时间，他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深入到千家万户，访病问患，对神经科多种流行病的复杂病因、多种病症有了最直接、最广泛、更为深入细致的了解与研究，最终撰写出了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乙等奖。

1988年8月，沂水中心医院神经内科成立，李松奎担任了神经内科住院总医师，在业务上担当起总纲。为了确实承担起这一重任，1989年9月，李松奎又到天津医学院神经科，参加了国家卫生部委托该校举办的专业进修班，学习了整整一年。所谓站得高才看得远，此时他虽然已经有了6年临床经验，诊治了众多的神经科患者，但是在这里，他还是进一步看到了与当时先进理念、技术水平的差距。他如饥似渴地对自己进行知识“恶补”，一丝不苟地做着各项“作业”。学院教授对他写的病程记录十分赞赏，当成优秀“范本”，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要求学员们向他看齐。

理论的不断深造，实践的不断锻炼，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李松奎的专业能力与水平不断登上新的阶梯，在神经内科疾病的诊疗上形成了一些独特优势，尤其是对一些疑难重症，他更练就了一双独具的慧眼和“拿手戏”。

“格林-巴利综合症”（现称之为“吉兰-巴雷综合症”），又叫“急性多发性感染性神经根炎”，一般认为是一种感染后的自身免疫的变态反应，病情严重者，可导致呼吸肌麻痹，死亡率很高。“重症肌无力”也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累及全身骨骼及肌肉，表现为肌肉极易疲劳，四肢瘫软，全身乏力等。这两种病，是神经内科时或遇到的疑难重病之一，严重危象者，都需要实行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抢救治疗。而在治疗这两种疾病上，李松奎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次，费县一位年仅20岁左右、病情已经岌岌可危的重症肌无力患者，由家人抬着前来找李松奎求治。患者曾经求治过其他大医院，但因病情过重，回答说“病人已经不行了”，让一家人大失所望，极度悲观。因患者亲属与李松奎的父亲是老熟人，打听到李松奎能够治疗此病，才专程前来求治。李松奎仔细检查过患者情况后，则肯定地回答说：“能治，有救！”一句话，让患者与亲属破涕为笑。李松奎先对患者采取了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抢救措施，等病情稳定后，又实行了精心的常规治疗。半个月后，病人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痊愈出院。患者亲属夸奖说：“真不愧是李智荣老先生之后，心好，医术高！”

有一次，沂南县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昏迷数日的老太太，经反复检查，病因不明，不得诊断也无从施救。亲属见老人已经生还无望，先给老人穿上了送老衣裳。但是沂南县人民医院的大夫坚持让其再等一下，随即特请李松奎前往会诊。原来，县医院没有神经科大夫，最后忽然考虑到病人是否患了神经科疾病，找到李松奎求助。李松奎赶到县医院一看，很快诊断老人是得了病毒性脑炎。于是随即按照此病对老人施治，很快收到了效果，老人得以起死回生。

沂水县卷烟厂一位青年职工得了化脓性脑膜炎，本来经过治疗得以康复，但奇怪的是，这位患者的病情总是不断复发，反复多次，不断地找李松奎为其诊治。李松奎心生疑窦，百思不解，按正常道理，不应当发生这种情况。忽然间，他心中茅塞顿开，反复地询问患者：“你的头部是不是受过外伤？”病人极力回忆，矢口否认。当时，本院尚无CT等检查设备。李松奎遂建议他去济南的大医院做一次检查。结果，检查报告完全证实了李松奎的怀疑。这位青年在一次骑车外出时，曾经与一骑车人发生过对撞，他只记得当时自己的脑袋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不久就发作了脑膜炎。而检查报告提示其大脑颅底有骨折病灶，这正是其不断复发的根本原因。这位患者随即进行了颅底骨折修补手术，最后完全康复。像这种疑中求真、拨云见日的例子，在李松奎的临床中比比皆是。

1993年4月，李松奎晋升为主治医师，同年6月，他担任了沂水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副主任，主抓科内工作。其间，他定期参加门诊值班及病房查房，组织并主持全科临床疑难、危重及死亡病例讨论，审鉴全科出院病历，督促全科人员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组织全科人员学习运用国内外先进医学经验，积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带领全科医护人员成功抢救重症“吉兰-巴雷综合症”致心跳呼吸骤停及重症病毒性脑炎、脑干出血、脑梗塞、蛛网膜下腔出血、重症肌无力危象、癫痫持续状态等危重病人数十人次，受到病人及亲属一致好评。同时，他还及时参加院内会诊及科室之间的会诊，多次应邀到莒县人民医院、莒县中医院、沂南县人民医院、沂南县中医院、蒙阴岱崮医院、费县人民医院、费县中医院等下级医院会诊，帮助解决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

有付出就有回报，有真才实学、真实业绩加上优质服务，就必然会得到业内与社会的充分肯定。1994年，在沂水中心医院进行三级医院评审期间，他带领全科医护人员乘势而上，加倍努力，严格标准，圆满达标，顺利通过了重点科室验收。

1998年12月，李松奎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任沂水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三、一如继往写新篇

1999年11月，李松奎从沂水中心医院调至临沂市中医医院。俗语说，“人熟是一宝，地熟必有情”。本来，多年来凭借自己的为人处事和医术医德，他在沂水中心医院上上下下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在广大患者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正是人在中年、事业如日中天的好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调到临沂呢？这全在他的一片孝道之心。父母年迈后，迁到了临沂城安居晚年。为了照顾伺候老人，他才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争取到父母身边工作。组织上十分理解与支持他，关键是临沂接收的方面。虽然是同一系统、同级医院，但是所处之地毕竟是从县调到市，这对一般人来讲，都觉得是有相当难度的事情。曾经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李主任，您关系还挺硬梆，是不是上边有人呀？”其实大家包括开这玩笑的同事都知道，所谓“自是金凤凰，不愁梧桐树”。李松奎内有长技、外有名气，到哪里都能立即独挡一面，力鼎大梁，在这个各行业、各单位都已经视人才如珍宝的年代，他是一名标准的炙手可热的“腕级”人物。实事也正是如此。临沂市中医医院的领导亲自给了他掷地有声的承诺：“李松奎，你哪里也别去，就到我们医院来，职务同等安排，家属也同时调到我们的医院，住房立即给你解决！”李松奎欣然应允，院里的承诺也随后兑现。

其实，市中医医院当时还没有单设神经内科。李松奎到来后，先在内三科担任副主任，专业仍然是神经内科。对此，李松奎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心中还有点儿“窃喜”。临沂毕竟

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更多，可以进一步丰富他的临床经验，也有着更为广阔的为患者服务的天地。特别是由于中医院在祖国医学上的一些独具特色的优势，让他学习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在中西结合上，有了一个坚实良好的平台与环境。而他的到来，也让市中医医院在神经内科即中医所讲的“奇恒”“神明”“元神”等疾病的西医诊疗上，有了挑大梁的人物，有力地促进了业务的开展与水平的提升。时隔不久，2001年7月，临沂市中医医院的神经内科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内五科）正式成立，李松奎担任了主任。2005年12月，他又晋升为主任医师。而李松奎则一如继往，奋发努力，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岗位上，创造着一个个神经内科的奇迹，续写着自己的辉煌。

李松奎刚到市中医医院时，院里还没有专门设置重症监护室。一次，科里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脑干出血患者，已经不能自主呼吸，随时可能窒息而亡。情急之下，他只能在病房中为患者实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上了人工呼吸机。病人住院治疗长达数月，其亲属对患者病情、症状又高度关注和敏感，一有细微的情况就急忙呼叫医生护士。时值冬季，病人亲属几乎天天夜里呼叫李松奎，有时甚至一晚上要呼叫几次。尽管李松奎知道医护上没有什么问题，病人病情也稳定，但是只要听到呼叫，他总是冒着刺骨寒风或者正在飘落的雪花，立即赶到病房，又是查看病人，又是安慰其亲属。那些日子，他几乎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圇觉。在李松奎和同事们的精心医护下，几个月过去，患者终于得以痊愈出院。由于长期卧床，患者出院时枯瘦如柴，弱不禁风。但是还是紧紧攥着李松奎的手，努力提高嗓门，连声说着谢谢。患者出院后，身体渐渐得以康复，还数次由孩子陪同来找李松奎表示谢意。李松奎和同事们的努力与奉献，换来了病人的信赖。几年后，这位患者又数次发作脑中风，都是来找李松奎做的治疗。

一次，科里收治了一位只有13岁的小女孩。患者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还不时抽风，病情十分严重。经过李松奎认真检查，确诊为重症病毒性脑膜炎，立即把孩子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在救治过程中，他一方面用西医的抗病毒药品，一方面用中医的“三宝”之一“安宫牛黄丸”，收到了出人意料的疗效，患者不仅挣脱死亡之神威胁、脱离了生命危险，而且一天天得以恢复，半个月后，痊愈出院。其父母感激不尽，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向李松奎和科里的医护人员表示谢忱与褒奖。李松奎也再次看到了中西医结合的突出优势与美好前景。

毋庸讳言，在目前医学科技发展水平下，对有些特殊、严重的疾病，即便是最好的医生、最高的医术，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回天，难以救治。尽管有些患者与亲属不理解、不接受而发生一些医患矛盾，但李松奎一直坚信，只要医生尽了最大努力而无他图，只要不是别有用心、故意“医闹”，最终相互之间一定能够取得理解。前些时间，他们收治了一位乙型脑炎患者，病人很年轻。前来就诊时，已经呈现严重危象，只得实行了气管切开术进行抢救。其间，李松奎几乎天天呆在重症监护室，随时密切观察着患者的病情进展。他又亲自组织联系了专家会诊，商量的若干救治方案，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对患者的预后不良，也提前告知了病人亲属，让他们早有了思想准备。患者亲属知道李主任的医德医术都堪称最佳，也知道他的名望。见他时刻靠上，亲自治疗，深受感动，十分体谅。最后，患者生命虽然没有挽救过来，但其亲属没有任何怨言，所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话语和真情。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医风高尚，李松奎已经连续10年被医院评为优秀工作者，连续数年被评为医院“十佳医生”及院级劳模。他还获得临沂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7项，在省级以上专业杂志发表医学论文20余篇，参编著作3部。但是他既不满足于个人取得的成绩，时时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他还满腔热忱地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尽心竭力地打造着神经内科的品牌。他处处率先垂范，时时言传身教，把自己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目前，神经内科已经由当时的一个科，发展到了4个科，医护队伍发展到了40多人，病床床位发展到了120张。他对自己的团队甚为满意与骄傲，经常对外说：“最可喜的是这伙年轻人，个个功底扎实，人人都很优秀，处处争先恐后，神经内科的未来，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推进会。9月6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推进会。会上，参与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逐一汇报了各自承担任务进展情况及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刘志强主任认真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情况汇报，对两部志书的编写进度表示满意，对于存在困难与问题，与大家一道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与措施。

市史志办组织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9月8日上午，市史志办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了“慈心一日捐”捐款活动。全办18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捐献活动，共捐款5200元。

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列席省史志办主任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意见》。9月11日，省史志办召开会议，学习省委《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意见》，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临沂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列席会议。

市史志办到广州市地方志馆、深圳市方志馆考察交流。9月13日—14日，临沂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副主任段洪等一行4人到广州市地方志馆、深圳市方志馆考察交流。广州市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黄小晶，深圳市史志办副主任王地久分别接待了刘主任一行。双方就方志馆建设深入探讨，并约定在方志馆建设、志鉴编纂、志书交换、信息互通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全市地方史志业务培训班成功举办。9月27—28日，全市史志业务培训班在市行政中心举办。省史志办市县基层志鉴编纂指导处处长李刚出

席并为学员授课，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各县区分管负责人和史志办业务骨干、市直部门从事志鉴编纂工作人员共150余人参加培训。

市史志办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述责述廉。9月29日下午，市史志办2017年领导班子成员述责述廉会议召开。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纪委监委驻一组副书记宋永峰到会指导，市史志办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上，市史志办党组成员依次就本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个人廉洁从政情况作了报告，对各位党组成员述责述廉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市史志办走访慰问困难职工。9月29日上午，市史志办副主任段洪等一行三人，对结对帮扶困难职工冯国斌进行了走访慰问，向其送上了中秋祝福。

市史志办组织收看十九大开幕会。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市史志办在办公室集中收看会议实况直播。在观看十九大开幕式盛况后，大家进行了交流发言，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盛会。十九大报告不仅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绘制了美好前景，也为史志事业的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全市史志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握时代发展新要求，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用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得力的工作举措做好各项史志工作，为“大美新临沂”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全部力量。

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

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调度会。10月26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志》《山东解放区志》编纂工作调度会。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出席并主持会议。

《沂蒙老支书》新书出版座谈会举行。9月上旬，河东区宣传部、区史志办、区档案局举办长篇纪实文学《沂蒙老支书》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是临沂市政协委员、青年女作家张一涵，16万字，共32章，采写内容跨越80余年。

王照波向费县史志办、平邑史志办捐赠《沂蒙山自然文化探秘》。10月上旬，沂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总工程师、临沂大学特聘教授、地质高级工程师王照波，向费县史志办、平邑县史志办分别捐赠个人专著《沂蒙山自然文化探秘》。《沂蒙山自然文化探秘》一书今年9月份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以地质学、地理学为基础，对蒙山的自然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详细记述了蒙山地质演化进程，天鼋神龟、蒙山古冰川、王安石碑等蒙山遗迹的重大发现和颛臾故国的神秘历史，理清了蒙山地质、地量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雄鸡高歌——大鸡烟厂红色历史档案》出版。10月，由莒南县史志办协助编辑，刘纯善等主编，山东沂蒙革命传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莒南县沂蒙红色文化研究会编纂的《雄鸡高歌——大鸡烟厂红色历史档案》问世。全书10万余字，附有彩色照片100余幅，再现了大鸡烟厂的历史变迁，为社会各界全方位了解莒南县历史开辟了重要渠道，同时也为红色文化传承和村落文化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